

司门口聚拢老城厢云烟

“五一”假日，黄鹤楼下的斗级营全面开街，与早已闻名的户部巷、青龙巷热度叠加，迅速火爆出圈。

漫步斗级营，一方“武昌古城·粮储仓库”的石台刻录史迹：斗级营明朝为“广积仓”，清代为军粮库，给养的发放机关，以“斗”计量而得名“斗给营”，后因谐音流变为“斗级营”。

司门口的机关，岂止一个斗级营？此地自宋代繁盛而衙署绵延，明代设湖广承宣布政司，下辖16个府，藩司驻节武昌，衙署设在蛇山西北麓，得名司门口。布政司主管钱粮户籍，对应京城的户部，附近就有了户部巷。门前的老街（今民主街）往东至忠孝门（今小东门），原名察院坡、抚院街，衙署相当集中。

司门口斜出一条深巷，青龙一样游走于老宅子之中，名曰青龙巷。周围的都府堤、楚材街、粮道街、候补街、三道街、戈甲营、太平试馆，皆与衙署相关，可见这一带来历不凡，人文历史厚重。

过去，青龙巷比户部巷更具盛名。老居民夸耀“蚊子不来青龙巷”，道的是龙脉之气风水不凡。因而，青龙巷起先不乏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后来涌入大贾小贩的商号铺子。武昌名小吃“老谦记”问世其间，只是一朵小小花絮。

与户部巷一色的传统民居不同，青龙巷1870年出现一座中西合璧的圣救世主堂，最初兴办文华书院，武汉教会学校由此发端。著名辛亥志士刘静庵加入的日知会，1903年由黄吉亭、胡兰亭等在圣救世主堂开办，播撒辛亥革命火种。1904年的斗级营也一样，张难先、胡瑛等聚会同庆酒楼，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诞生了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司门口，衙署林立，门庭森严，偏偏成了革命的“风暴眼”。

1935年，长街（今解放路）由南而北延长，打通了蛇山，也打通了藩司大院，直抵中山路，司门口有了十字路口，更加热闹。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一改仅仅依靠汉阳门轮渡的交通格局，从蛇山下桥就来到了司门口。于是乎，大桥百货、大桥时装、大桥酒楼、大桥照相、大桥浴池、大桥刻章……老门面换了新招牌。1979年，“老谦记”复业，首先来这里重现江湖。

1984年，黄鹤楼回归，司门口依傍千古名楼，更是获得新机遇，户部巷抢先闻名天下，成了“汉味小吃第一巷”。游罢黄鹤楼，吃碗热干面，谁说不是雅兴趣事？

武昌人精明机敏，把黄鹤楼文章做足，提炼出“遇见黄鹤楼”的理念，盘火了青龙巷，又盘火了斗级营，司门口的老底子倍儿升值。

不是吗？青龙巷“黄鹤楼红墙”广受追捧，而今升级摆到高架公园，打卡留影“更上一层楼”。斗级营不甘落后，青瓦丛中耸出“黄鹤楼天台”，嘬着小龙虾，品着武昌鱼，烤着羊肉串，顺便把一张全视角同框大片给拍了。

斗级营、户部巷、青龙巷，以司门口为枢纽，聚拢武昌老城厢600年烟火。可斗级营并不“倚老卖老”，人家在大桥下的标牌，上书“YOUTH（青年）发展型街区”呢！

（简桦）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6年第5期（总第403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伟 胡蓉

唐云峰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玮

编辑：许濛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司门口聚拢老城厢云烟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56,《水调歌头·游泳》壁画“一桥两山” / 罗建华

风雨同舟

<<<< <

14 研以致用的碳路先行者 / 孙永平

九城同心

<<<< <

18 余三胜：一声皮黄出罗田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一） / 王松平

委员天地

<<<< <

22 光影作桥，让世界“看见”中国 / 袁明辉

27 信用筑基，碳路赋能 / 袁刚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 31 初心铸沥青 实干筑国创
/ 郝立群（口述） 江志伟（整理）

人物述林



- 36 湖北金融先驱徐育华（上）/ 麻建雄
42 人生如织：我的求学与工作足迹 / 刘松余

都市寻踪



- 48 王扶林在武汉讲述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
/ 王扶林（口述） 马先松（整理）
53 竹枝词中的汉口城市图景 / 黄学文
57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八）/ 刘宝森

往事漫忆



- 62 我在汉正街长大（一）/ 李胜洪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zsl@163.com

1956，《水调歌头·游泳》擘画“一桥两山”

◇ 罗建华

轮印：70年——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来武汉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以“一桥飞架南北”展现新中国壮举，赞美大武汉雄姿。如今，武汉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一桥两山”定位为核心承载区，一个世界级文旅地标呼之欲出。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从长沙来武汉，一下飞机就提出要看长江大桥建设工地，转乘“武康”轮迎流而上，从大桥2、3号桥墩之间驶过，从3、4号桥墩之间返回，详细了解施工进度，视察近一个小时。

6月1日至4日，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又两次从大桥桥墩中穿行，极目楚天，畅想未来，《水调歌头·游泳》纵笔擘画“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大气磅礴的豪迈诗行，定格“一桥两山”的瑰丽画卷，引发无数人对武汉的向往。



七十年春华秋实，“一桥两山”经久弥新，越来越显出独特价值，越来越引发认识深化，江城一下找到了“城眼”。2026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打造‘一桥两山’世界级文旅地标”。武汉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期间，各界委员竞相献计献策，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一桥两山”文旅核心区，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建议案》。

“一桥两山”以长江大桥为纽带，串联龟山、蛇山两大历史文化名山，汇聚黄鹤楼、晴川阁、古琴台、电视塔、月湖五大名胜地标，集群十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呈现武汉千年文脉浸染的时代新貌。

从地质角度追溯，龟蛇两山隆起的主体结构，都由四亿年前的坚硬石英砂岩组成，共同经历了从大海上升为陆地的冲刷淘洗，在长江波涛之下同生共长，形成亘古不变的自然联系。

从人文角度观照，龟蛇两山丰厚的文化积淀，在风雨过往的时光雕刻下，精华荟萃，流韵纷呈，各有风采又互为辉映，生发出与时俱进的精神互动。

细细品味“一桥两山”，它所蕴藏的城市基因和人文密码，从“大禹文化”到“知音文化”，从“三国文化”到“岳飞文化”，从“黄鹤楼诗词文化”到“近代工业文化”，从“首义文化”到“红色文化”，交替中有叠加，传承中增丰厚，共生中显特质，互补中呈大观，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活化存在，将向全世界徐徐“打开”。

夏口城并峙却月城

“五一”假日，游人踏上蛇山的山脊步道，一步就回到公元454年。南朝宋孝武帝



古鄂州城垣

时期建造的古鄂州城垣，以它1572年的历史和1790米的长度，在武汉中心城区堪称最为古老的城垣遗址。

往前追溯到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东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次年在鄂州（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夏口，都武昌”寥寥六个字，揭示了武昌建城1803年的开端。此后，南朝扩建鄂州城，唐代再修鄂州城，砖城墙叠压土城墙的编年史，标识出蛇山在武汉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对岸的龟山胜过蛇山，早在东汉末年，江夏郡太守刘琦为抵御东吴南下，在龟山以北至汉水之南建城，因形如半月而称却月城。城下的月湖，紧傍却月城原名却月湖，被岁月之水浸蚀掉一个“却”字。

夏口城，却月城，隔江相望互为敌垒，分别成为武昌和汉阳的历史源点，从而奠定武汉“双城并峙”的格局，直至千年之后的明代中叶汉口崛起，重塑为“三镇鼎立”。

夏口城筑城的标志，是它西南角临江的一栋瞭望哨楼，屡毁屡建声名日隆，演变为千古一楼黄鹤楼。却月城因遭东吴攻破，连扼守江畔的铁门关也荡然无存。

黄鹤楼与铁门关，浓缩了三国争霸的风



铁门关

起云落，可蛇山因黄鹤楼歌赋不绝，“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龟山倒留下弥衡墓、鲁肃墓等三国遗迹。祢衡狂放不羁，以“击鼓骂曹”槌响风骨，其《鹦鹉赋》不仅使鹦鹉洲得名，也给了崔颢“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神往。鲁肃接替周瑜担任大都督，曾在龟山镇守，乃至后来山称鲁山、城为鲁山城。以致晚清张之洞仰慕鲁肃，为鲁肃墓题下一联：“联蜀拒曹，乃公一生学问；舍奸去诈，则吾十年用心。”

1992年，龟山兴建“三国城”，铁门关、群英道、计谋殿、赤壁画馆，重扬当年的鏖战征尘。群英道上，三国人物雕塑群像由东而西，刘备、关羽、张飞、孙策、孙权、曹操栩栩如生，满眼金戈铁马，怀想“煮酒论英雄”。铁门关三拱城门形制巍峨，跨越关羽奋蹄赤兔马的洗马长街。城楼陈列“三顾茅庐”等塑像场景，回旋出诸葛亮“功在三分国”的历史玄机。

赤壁画馆为双环形天坛式仿古建筑，一幅《赤壁大战》全景环幕壁画周长135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凝聚百名画家心血的艺术成就，敢与埃及《六日战争》、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比利时《滑铁卢之战》

等全景画媲美。今年以来，赤壁画馆运用科技复活历史，化身为沉浸式剧场。计谋殿更名为知音殿，也推出了沉浸式餐秀“三国群芳宴”。

其实，蛇山那边并未忘记“三国志”，黄鹤楼二楼大厅布局有两幅壁画。一幅《孙权筑城》，述说孙权为据守长江险要、警备水军来犯，在蛇山筑城建楼的决策由来。一幅《周瑜设宴》，反映周瑜在黄鹤楼宴请刘备逼讨荆州，被诸葛亮锦囊妙计破解的戏剧性画面。联想

起来，元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取材同一故事，全国20多个剧种移植传唱，剧名后来直接改称了《黄鹤楼》，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也曾反串小生饰演周瑜。

行走在长江大桥两头仰望，蛇山耸立“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龟山挺拔“亚洲的桅杆”电视塔，不能不感谢两山对大武汉孕育壮大的深远影响。如果说，长江汉水是哺育武汉的母亲，龟蛇两山则是构建江城的脊梁。

黄鹤楼遥对晴川阁

武昌因武而昌，黄鹤楼则因文而兴，硝烟烽火转换为白云黄鹤，以绝佳之景引来历代文人雅士，酿成“黄鹤楼诗词文化”，这种独具一格的殊荣，恐怕任何古楼都难以望其项背。

据《黄鹤楼志》统计，900多位诗人登临黄鹤楼，1500多首诗词华章斑斓，亮出古代顶级诗家的排行榜。从崔颢、孟浩然、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杜牧、贾岛到范成大、陆游、岳飞、陈孚、杨慎、张居正……无不有佳作流芳。



李白搁笔亭

只要接触中华诗词，绝对绕不开黄鹤楼。许多海外人士熟知武汉、认知中华，也是从崔颢《黄鹤楼》启程。“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莫道仙人神话，更有空灵境界，不愧《沧浪诗话》赞其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为第一”。黄鹤楼蒙此“第一”，更加名动天下，何况还有狂傲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为之加持。

在黄鹤楼景区，搁笔亭传诵“李白不题黄鹤楼”的佳话，但面对崔颢的压卷之作，他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也乃千古绝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如何？此外，落梅轩留存《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句“江城五月落梅花”，据说是有关武汉的典籍首次出现“江城”。如今，游人喜爱黄鹤楼的《梦回太白》“诗词互动”节目，不是偶然。

品味崔颢《黄鹤楼》、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我们不难发现，“黄鹤楼”如同直接出现在剧名一样，往往也直接出现在诗题。白居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如此，杜牧《寄牛相公赴黄鹤楼崔侍御宴》也如此；贾岛《黄鹤楼》如此，王维《黄鹤楼送康太守》也如此；蔡道宪《黄鹤楼夜宴惜别》如此，陆游《黄鹤楼》也如此；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如此，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更如此。尽管有的赋诗之时，黄鹤楼实已坍塌，但它作为一个丰赡的文化意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每每还注入了时代情愫。

楼因诗传，诗因楼盛——这种彼此成就、双向奔赴，蔚为“黄鹤楼诗词文化”，唤起对岸的龟山与之共情，以“晴川历历汉阳树”遥相呼应。禹功矶上晴川阁，“大禹文化”云缠雾绕，同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



大禹神话园与晴川阁

晴川阁，坐落于龟山东麓，左襟汉水，直面长江，明嘉靖年间由汉阳知府范之箴所建，与禹稷行宫相伴，既有“三楚胜境”的盛誉，又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诚如国学大师张舜徽《晴川阁修复记》中所言：“沿江景色如画，各有攸胜。若论风光之明媚，形势之雄奇，盖未有过于武汉者。以有黄鹤楼、晴川阁夹江而峙，可收上下四方之壮观于眼底也。”“偶坐阁上，仰望晴空无际，俯听川流有声，风帆沙鸟交映左右，几疑泛舟江湖之上，忘其身犹在龟山东麓也。”

晴川阁承载“大禹治水”的传说，远远指向尧舜禹部落联盟时期，无声诉说武汉这片云梦泽大地的古老。神话叙事“导汉入江”，以龟蛇两山为载体口耳相传，深深融入地方文化记忆，春秋战国时期载于官方文献，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今年3月，适逢晴川阁建成500年，樱花时节焕新归来。2006年沿江滩建成的大禹神话园，5月1日也刚好开放20年，游人如织。漫步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途中“剖脰禹生”“搏杀相柳”“禹阅九鼎”“三过家门”等14座系列雕塑，将洪荒时代人与天的生死攸关掷到眼前。走进大禹文化博物馆，《九州禹踪》《水与城——武汉治水史迹》两大展览，传递着改造自然的大无畏，也闪烁着顺应生态的大智慧。



古琴台高山流水殿与知音雕塑

古琴台相望岳飞亭

晴川阁两层飞檐悬挂铜铃，风过声动飘越龟山，古琴台浮现在汉水月湖拥抱的天光云影之中，凝聚的“知音文化”同样古老。

春秋时期，楚国上大夫俞伯牙擅琴，乘船沿江而下，路经汉阳突遇狂风骤雨，停舟龟山脚下弹奏《高山流水》，一介樵夫钟子期竟能领悟个中深意。二人“同气相求，乃谓之知音”，相约来年再会。不料伯牙依约重访，子期不幸病故，在墓前复奏《高山流水》悲痛万分。曲终，破琴，绝弦，无比断然。明代冯梦龙著《警世通言》，以《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专为记之，并写诗叹息：“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古琴台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清嘉庆年间，被誉为“天下知音第一台”。“琴台”碑为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手迹，“印心石屋”石刻由清道光皇帝御书。武汉人若是老友相聚，来此地叙旧，情与景格外相宜。因了一份知音之缘，武汉琴台剧院、琴台音

乐厅和武汉戏曲演艺中心，全都来月湖聚集与之呼应。

古琴台在龟山西麓，知音殿在龟山东头，从铁门关拾级而上，一重回廊一个高度，上至平台豁然开朗，电视塔一柱擎天。回身环顾大江，视野极好，鹦鹉洲、杨泗港、白沙洲，一座大桥一重境界。电视塔下，“龟风飞云”观景处提供多机位视角，游人一拨抢一拨，想不成为网红打卡地都难。

从“龟云飞渡”连线蛇山“岳飞功德坊”，岳飞铜像飞奔而来，《满江红》怅然轰鸣——“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廓；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满江红》赤胆盈胸，满是收复河山的壮志悲情。1937年九一八纪念日，爱国人士把它刻成石碑立在黄鹤楼旧址处，同时制成拓片分赠抗日将士，可见岳飞“精忠报国”精神，在民族危亡时刻释放特殊能量。

岳飞驻节武昌，苦心操练岳家军，七年枕戈待旦，四次北伐出征，连败金兀术主力，推进至朱仙镇，眼看距故都开封仅四十五里，无奈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班师，功亏一篑。岳飞曾义无反顾发誓“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可只落得个“空悲切”。

蛇山周围，岳飞遗迹世所难忘：帅府司门口，中军营梅家山，马队马蹄营，水军岳家嘴。可惜，1170年始建的全国第一座岳飞庙毁于战乱，但岳王台遗址、岳武穆遗像亭尚在发问“何日请缨提锐旅？”古老的武昌城墙，也嵌入了烧制有“前军”“踏白”



岳飞铜像

字样的岳家军城砖，近年来不时现身坊间，激荡“八千里路云和月”。

龟山这边，南走不远，亦有藏兵阁、屯甲岭、马沧湖、翠微路等老地名，记取了岳飞“藏兵屯甲”“马踏湖汀”“寻芳翠微”的印痕。区区一名武将，只有当他肩负起民族大义，才能演绎为一种文化超越时空。

陈友谅愧对徐寿辉

元朝替换宋朝，明朝推翻元朝。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皆加盟“红巾军”，三人经历前后纠缠，均与龟蛇二山交集。

龟山南麓的汉阳公园，“红巾亭”“红巾湖”来历非凡，这里曾有“天完国”国都遗址，泯灭在假山花径之中。徐寿辉1351年在蕲州举起义帜，为红巾军第一代领袖，以蕲水为都，国号“天完”，推行“摧富益贫”政策，史称“农民改革家”，鼎盛时期控制鄂、赣、皖三省，1356年迁都汉阳。陈友谅1355年投奔徐寿辉帐下，很快执掌一方，1360年趁内乱而弑杀徐寿辉。

陈友谅1360年建立“大汉”政权，志在“抗元复汉”，都城先立江州，次年迁来



陈友谅墓

武昌。朱元璋 1352 年进入郭子兴红巾军系统，1363 年“讨逆”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使其失败并中箭身亡，“还尸武昌，葬于黄鹤山南麓”。1908 年革命党人发现荒草覆盖的陈友谅墓，1913 年加以修葺并增建牌坊，牌坊前后各书“江汉先英”“三楚雄风”，彪炳其人功业。

武昌、汉阳，同期有两个农民政权在此立都，其战略要地的分量，为龟蛇两山见证。朱元璋 1364 年攻克武昌，第六子朱桢出生，大喜之下封其楚地后为楚王，也是看中武昌这一福地。

楚王府背依蛇山南麓，按南京故宫的蓝本缩小规制而建，铺衍到紫阳湖边，共历八代九王 262 年，明末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焚毁，现存双眼井、八卦井、梳妆台三处遗迹，还有王府口、中营街、后宰门数处地名。朱桢倒是安然逝于楚王府，隆重葬于江夏龙泉山昭园，亦为武昌远郊的名胜。

陈友谅墓处在楚王府后院不远，默然看到改朝换代循环往复，不知是否感到愧对徐寿辉？农民起义代表不了先进的生产力，历史局限性昭然若揭。

抱冰堂映照凝铁园

张之洞为洋务派后期中坚人物，督鄂 18 年推行“湖北新政”，可谓披肝沥胆，引《吴

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励，晚年号“抱冰老人”。1907 年，当他进京升任军机大臣兼体仁阁大学士之时，门生故旧为之建堂纪念，堂名“抱冰堂”。如果不知这一来由，火炉武汉何以“抱冰”，多少令人费解。

抱冰堂原为张之洞生祠，他逝世后改名张公祠，但还是“抱冰”富有哲理，习以延称。建筑不算气派，九脊四坡顶，漏花青砖墙，单层飞檐穿斗漏花，位于蛇山首义公园，与武昌首义纪念设施紧邻，折射出清末时局的瞬息万变。确实，1910 年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此召开会议确立士兵代表制度，1911 年湖北新军在此召开代表大会商议起义，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力扶大厦之将倾，浑然不觉历史的吊诡。



抱冰堂与凝铁园

当然，后人不会忘记张之洞在近代工业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肇兴之功，蛇山的奥略楼、十桂堂、抱膝亭都寄托缅怀。对岸龟山北麓的小小凝铁园，更是直接凝聚“汉阳造”的往昔星火。

龟山北路依山蜿蜒十分幽静，一尊重约 200 吨的凝铁形如卧牛蹲在崖下，它虽是 1923 年 9 月汉阳铁厂 4 号高炉坍塌事故的意外遗物，却标志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蹒跚起步。

凝铁园上方山顶，近年新辟景点“张公远眺处”，纪念张之洞当年视察山下的汉阳铁厂。这个长江汉水交汇的宝地，汉阳铁厂 1891 年 1 月兴建，1894 年 6 月出铁，诞生中国第一家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在整个亚洲时间最早又规模最大。西方惊讶之余，视之为“东方睡狮”的觉醒。京汉铁路 1000 多公里的钢轨，全从汉阳铁厂出发，奠定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原材料基础。1908 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集团式发展更开先例。1924 年，汉阳铁厂未能经受住国际市场波动和日本外债压力，全面停产。1938 年，主要设备内迁重庆，厂房在战火中损毁殆尽。

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1890 年开办，引进德国新式技术设备，开始机械化生产枪、炮、弹及配套系列产品，装备全国新军，最后打响了埋葬封建王朝的“第一枪”，又是历史的吊诡。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构成“汉阳十里工业长廊”，开创著名的“汉阳造”时代，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重要发源地，2017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工业遗产。眼下，龟山北片将打造“国际文旅会客厅”，为武汉“五大中心”之一国际交往中心的主体设施。

首义纪念碑共鸣红色战士公墓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起义军抢先占据蛇山，南湖炮队进城上山架炮，吓得湖广总督瑞澂炸开总督府后墙，钻洞逃往“楚豫”号军舰，清军群龙无首一败涂地。

炮台如今架在蛇山山顶最高处，5 门铁炮炮口仍然对着湖广总督署方位。首义当日在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前捐躯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当是欣慰含笑。

山上首义公园全国唯一，山下湖北起义军政府红楼依旧，一起彰显辛亥革命“首义文化”。孙中山纪念碑建于 1928 年，原在武昌桥头坡下，1994 年迁来抱冰堂旁。红楼大门前，1931 年竖立孙中山铜像，迎来 2011 年建起辛亥革命博物馆。山上抱膝亭前，1933 年竖立黄兴铜像，1955 年迁至黄鹤楼剧场东侧，1985 年再迁龟山东头，与孙中山铜像隔江相望。龟蛇两山，总是一起挽住历史风云。

1981 年，为纪念武昌首义 70 周年，武昌首义纪念碑剑指南天，11 米高度的碑体喻含 1911 年爆发时间，叶剑英元帅为之题写碑名。1995 和 1996 年，又相继增添首义志士群雕和首义枪声铜雕，视线朝向山南的



起义军炮台

首义路，直抵起义门城楼，回望江畔“三烈士亭”。

蛇山南坡绿树成荫，掩映着李书城、徐旨乾、高亚鹏三处公馆，其中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首义时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及其弟李汉俊在上海望志路的石库门联排住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李书城为第一任农业部长。

李书城之弟李汉俊本名李书诗，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来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小组，代表上海小组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再回武汉，虽因意见分歧脱党，仍坚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2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后由李书城安葬在伏虎山西坡。

更多的共产党人，长眠于龟山西麓的烈士陵园。在李汉俊前后，倒在屠刀下的革命者多达数千，包括夏明翰、詹大悲、黄五一、魏人镜、何羽道、任开国、马骏三、黄赤光等各级组织负责人。其中，最著名者为向警予——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她面对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奉命转移却坚守江城，1928年5月1



向警予烈士陵园

日凌晨，慷慨赴死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当天深夜，家居汉阳毛家堤的陈春和，同他的舅弟王斋公冒死潜入刑场，收殮向警予遗体，摆渡过河到龟山，埋葬在补乾亭旁。陈春和出身汉阳铁厂工人，担任湖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顶着腥风血雨，多次趁夜带领几名工人划船过江，奔往汉口余记里空坪、济生善堂广坪和武昌文昌门外多个刑场，背负烈士遗体埋葬到补乾亭旁，用大石块作标记，录下烈士名册。谁知，1929年2月，陈春和、王斋公亦被杀害于文昌门外，烈士名册下落不明，后人纪念统称以共同的英名——“红色战士”。

1978年5月，向警予英勇就义50周年之际，龟山面向月湖落成向警予烈士陵园。1986年10月，又将红色战士公墓迁来。向警予墓由邓小平题写碑文，红色战士公墓由彭真题写墓名。

武昌是首义之城，汉口是大革命中心，为中华民族而献出生命的英烈，在龟蛇两山隔空发出铁血共鸣。

龟蛇两山，峰不见高，岭不见险，人文史迹几多奇崛。漫山的名胜遗址，还有胜像宝塔、龙华寺、表烈祠、鼓楼洞、蝴蝶泉、湖北省立图书馆等，每一处都有打捞不完的史实故事。两山绵延所至，武昌的司门口、阅马场、大成路，汉阳的显正街、凤凰巷、北城路，老城根脉托举的市井烟火，又为“一桥两山”演绎活色生香的外传。

“一桥”激活“两山”

大江天然屏障，龟蛇各在彼岸，文脉悠远而长期无法伸手相握。特别是长江汉水交汇于此，漩涡逆流，风高浪急，“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并非幸灾乐祸，“集家嘴的划

子播得趟”也不是作秀表演，道出的是多少凶险和无奈。

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横空出世，“天堑变通途”夙愿圆梦。从此，三镇雄浑一体，山川形胜交织人文史迹，城市形象融合时代精神，给了武汉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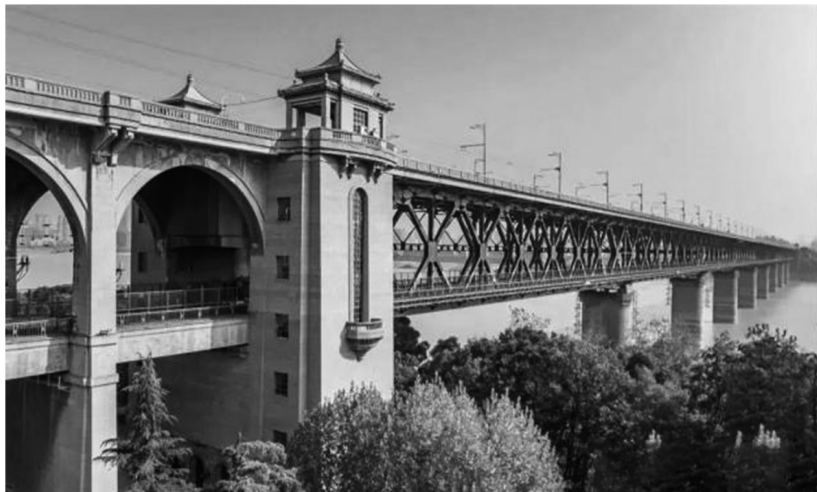
“一桥两山”脉动江城，武汉最具辨识度的地方，没有第二。无论登上蛇山黄鹤楼，还是伫立龟山电视塔，遥望远方，环顾四野，两江让三镇浩荡出大城气派，一桥又将两山汇聚为大城风范。

“长虹所及，非凡的辽阔”。长江大桥铁路公路上下两层，全长一千六百米，豪气干云，秀影漾波，本身就是鸿篇巨制的艺术品，置身于世界桥梁的煌煌史册，堪称匠心独运的建筑美学经典。

曾经将解放大道和它两头的堤角、古田工业区，比作一条金扁担挑起两个金篓子，如今觉得放在“一桥两山”身上似乎更好——“两山”是人文的金篓子，也是生态的金篓子。

这个春天，“汉马”的长跑健将，“楚超”的足球骁勇，“戏码头”的百花奖得主，“樱花有约”的旅行团美女，一群群从长江大桥迈过，吹吹江上的风，看看两岸的山，真叫人心旷神怡。武汉人自己呢，乘坐怀旧的绿皮车，从铁路钢桁几何图案中缓缓驶过，指点曾经的相识，感受别样的新鲜。

“一桥飞架南北”——价值锚点，视觉符号，现代科技范与传统中华风完美契合，独有的时空赋能，给了我们恣意浪漫的无限畅想，它可以变幻为巨型城市会客厅，也能



够担当流动露天博物馆，还将随时推出种种展台秀场，让游人走在沉浸式的剧情中。

新的时代，新的思维，武汉人对“一桥两山”的挚爱，上升到新的高度，正如《长江日报》一篇报道所言——“把最精华的三千年底蕴，放在世界的坐标系里重新丈量”。现代工业文明的杰作，古老传统文化的精华，城市不息前行的脉动，时代立体档案的印记，全在这里共同发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核心承载区。到时候，体会“江汉朝宗”，品味“江汉揽胜”，最佳位置无可复制。

武汉，历来雷霆震荡激越潮头，更有风雅无边挥洒江天，独据中国地理版图的天元之位，是王侯角逐之域，也是商贾云集之处，是兵家争夺之地，也是市井聚落之所，是舟楫纵横之泽，也是诗人纵情之野，又必定是全球游人心系之往……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罗建华，长江日报社高级编辑

研以致用的碳路先行者

◇ 孙永平

人物名片：孙永平，民建中央能源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建湖北省委能源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建武汉市委会常委；市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华中科技大学从事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学者，从湖北碳市场试验田到联合国气候大会讲台，十多年深耕碳经济领域，我始终以兴趣为源、情怀为舵、定力为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落到国家“双碳”战略中，在民主党派与学术科研的同心同行里，走出一条研以致用、服务家国的碳路征程。

广泛调研，探索湖北特色的碳市场制度体系

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湖北是其中覆盖规模最大的省级试点。我被纳入湖北省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的政策研究团队，深度参与了湖北试点碳市场的顶层设计工作，特别是在配额分配与碳泄漏政策设计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要摸清行业的真实情况，光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是不够的。我们团队多次赴钢铁、水泥、电力、化工……湖北的大工业企业调研。要借鉴国际经验，就带队出国，远赴英国 AFRY 咨询公司、法国电力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钢铁协会、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等单位，跟欧盟专家面对面聊，看他们的碳市场到底怎么运转的。

中国的情况跟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才搞碳达峰，我们是在发展过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双碳”目标。基于这个现实，我提出了配额分配的“公平、效率、能力负担”三原则。说白了，就是让碳成本在各行各业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既不能“鞭打快牛”，让那些早早就开始减排的企业吃亏，也不能让大家都“集体躺平”，没了减排的动力。这套思路，目的就是给企业一个稳定的预期，让它们愿意在低碳技术上投钱、投人。

通过湖北试点碳市场多年数据验证，我开发的配额分配方法学能更精准地识别行业差异，最大程度发挥碳交易体系的减排激励效果。我主持完成的《湖北省分行业碳控排系数方案》被湖北省发改委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连续多年采用。更令我欣慰的是，这一方案中的部分创新性成果被中国国家碳市场建设方案采纳，体现了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在湖北碳市场这片“试验田”里耕耘多年，我始终相信：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不光要写论文，还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仅仅是政策咨询还不够，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支撑，才能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多年来，我在《经济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光明日报》理论版、*Science*、*One Earth*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不少还入选了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2021年，我作为首席专家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研究”，2024年获准免鉴定结题；2025年，延续上一个重大项目的研究主题，我再次以首席身份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碳定价机制设定、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影响研究”。此外，还主持了二十多项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气候变化国



“2022年全球变局与中国方案”高端论坛现场

际合作战略研究》《资源丰裕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或参编《蓝皮书：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碳排放权交易概论》等著作和教材。

2025年，我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这是国际学术界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一份认可。这些成果的背后，是无数个伏案到深夜的夜晚，是一次又一次扎进基层的调研，更是对这个领域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执着。

学术成果之外，我同样重视政策建言。2017年3月，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我主笔撰写了《关于支持湖北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提案》，推动这份提案以湖北省代表团集体提案的形式向全国政协提交。该提案经全国政协审查立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办，环保部会办。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正式落户武汉，湖北成为全国碳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承载地。

2018年，我撰写的《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顺利衔接的思路与建议》被国务院参事室《国参建言》刊发并上报主管部门，为国家碳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篇报告能够被送达决策层，在我看来不仅是对

个人研究工作的认可，更是对“研究要有现实意义、观点要有政策价值”这一治学理念的印证。学者的职责，不仅在于写好论文，更在于在关键时刻发出有依据、有分量的声音。

在国际舞台上，我连续多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2014年秘鲁利马的COP20，到2023年阿联酋迪拜的COP28，再到2024年阿塞拜疆巴库的COP29，多次站上联合国的讲台，展示中国气候变化的理念、行动和成就。通过这些场合，我努力把中国在气候治理上的智慧和方案，讲给世界听。

除了学术会议，我还积极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湖北日报》、*Nature News*、*Carbon Brief*、《南华早报》等国内外媒体，向公众传播气候治理知识，提升大众对中国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战略的认识水平和支撑力度。每一次参会、每一次接受采访，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在全球气候议题上，中国学者有话可说，也有事可做。我们不只是政策的跟随者，更可以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方案的贡献者。

在我深耕环境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没有一本专门聚焦于环境经济学的学术期刊。相关成果要么散落在综合性经济学期刊，要么发表在偏向自然科学的环境类期刊，学科归属模糊，交流平台分散。

于是，我推动创办《环境经济研究》，担任常务副主编。这是国内唯一一本专注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期刊，经过持续建设，目前该刊已经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成为中国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生产地和重要传播平台。这本期刊不仅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更是中国环境经济学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

从书斋到现场，让研究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策

2018年4月，我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前辈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敏锐洞察，对社情民意的真切关怀，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理性构思，让我深刻体会到民建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经济土壤、与中国发展大局同频共振的实践集体。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让我能结合自身专业思考现实问题，并有渠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切实的政策建议。这种“研以致用”的畅快感，是在书斋里写论文时感受不到的。

入会8年来，我坚持“无调研不提案”的优良传统，先后赴8个省20多个城市调研，形成40多篇调研报告。这些报告的背后，是无数次深入企业、社区、政府部门的田野调查，是与地方官员、企业家、普通市民的面对面交流。

调研的质量决定了建言的分量，这些报告中，1篇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1篇获国家级领导人批示，1篇获中办采用，2篇获全国政协采用，2篇获中央国安委采用，10多篇获民建中央采用，20多篇获新华社内参、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等部门采纳。多篇报告被民建中央采纳为全国两会集体提案。

作为市政协委员，我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围绕碳金融、碳市场、碳交易等主题，积极撰写各类政协提案，推动武汉利用“中碳登”+湖北试点碳市场的双组合优势，形成碳金融产业的规模集聚效应，打造低碳产业新业态，探索绿色低碳转型新机制。在我看来，提案不是写完就结束的文字工作，而是一个持续跟踪、反复推动的过程。一个好



获 2024 年度“同心奋斗者”及民建中央 2024 年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的提案，从问题的发现，到方案的提出，再到政策的落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坚守。

2024 年，我作为湖北唯一代表，获得民建中央“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同年获评武汉市委统战部“同心奋斗者”荣誉称号。2025 年，我又荣获民建中央“全国优秀会员”称号，再次获得民建中央“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连续 5 年获得民建湖北省委会和民建武汉市委授予的“参政议政优秀个人”荣誉称号。此外，我还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这些荣誉，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责任的提醒。

兴趣、情怀、定力，照亮碳研究长路

很多学生问我，做学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总是三个词：兴趣、情怀与定力。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

兴趣是动力的源头。我在碳经济领域研究了十多年，从未觉得厌倦，恰恰是因为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太有意思了——碳市场需要考虑气候问题、产业问题、贸易问题和科技问题，最终更是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每段时间回头整理自己的研究思

路，总能发现新的维度和层次。我常常跟学生讲，如果你觉得读文献是受罪，那你大概还没找到真正让你着迷且有重大价值的问题。找到那个问题，其余的一切困难都会变得值得。

情怀是研究的方向盘。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这个领域，是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为推动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个学者，不应只关心自己论文的引用率，更应该关心自己的研究对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定力则是最稀缺的品质。在学术界，各种诱惑和压力并存：发文章要快、要多、要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做咨询要及时、要批示率；媒体希望你“爆款”观点……真正能保持定力，坐得住冷板凳、沉下心来做长期研究的人，其实并不多。在国际合作上，我筹办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当选 10 多个国家级学会的常务理事或理事，将国际资源引入国内研究，探索低碳转型的跨国比较路径。这些工作本身也是一种“走出去”的定力——不是为了镀金，而是为了让中国的研究成果真正融入国际学术对话。

未来，我将牢记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责任，依托民建参政议政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双碳战略实施、全球气候治理、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发力，筑牢“实地调研—学术研究—对策建议”三位一体闭环，让每一份建言都扎根现实、兼具学术深度与政策力量。

余三胜：一声皮黄出罗田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一）

◇ 王松平

由两代以上构成的京剧世家，是中国戏曲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京剧界有一种耳熟能详的称谓：“余门三代”“京剧三余”，即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这既是对余门祖孙三代献身京剧艺术的褒扬和肯定，也是对他们的崇敬和怀念。余三胜是中国京剧的开山鼻祖，余紫云是青衣行当的先驱，余叔岩是京剧主要流派的创始人。如今，京剧享有“国剧”“国粹”的地位，从鄂东大别山南麓走出的余氏祖孙三代居功至伟。一门三泰斗，不仅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传奇，也堪称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出走罗田，北上求艺

余三胜，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七娘山人，出生于清嘉庆七年（1802），谱名开龙，乳名起云，又作启云，因叔伯兄弟中排行第

三，故名三胜。余三胜自幼聪慧，喜爱歌唱。10岁左右，常有渔鼓艺人和本土东腔戏班来湾里演唱，他就在一旁学唱渔鼓和东腔，还用猪尿脬仿制渔鼓筒子，又拍又唱，竟有模有样。

父亲余继善以农为生，虽也望子成龙，却不执着于“科举及第、光宗耀祖”那条老路。余三胜13岁时，便被送入安徽某科班学艺。因安徽与湖广交界，两省民间艺人常有交流，一些戏班也演唱汉调，余三胜以学汉戏为主。他天资聪颖，悟性高，肯吃苦，入科不久便将“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等十个行当掌握娴熟。三个月后即登台演出，三年零六个月圆满完成学业，顺利出科。

从安徽戏剧科班结业回家后，余三胜进入白庙河黄氏东腔戏班担任演员。十七八岁时，为谋求发展，他毅然告别家乡和父母，前往汉口闯荡。恰逢安陆陈氏桂林班在汉口

演出，他搭入桂林班唱戏。桂林班名气颇大，各地有庆典，多不远千里前来约戏，余三胜在其中受益良多。

嘉庆末年，余三胜辞别桂林班，北上河南，继而辗转进入北京。当时北京舞台以昆曲为主，余三胜虽搭入安徽三庆班，演出机会却不多。他听说天津戏曲界比北京更为活跃，便离京赴津，顺利加入天津侯家“群雅轩”献艺。为迎合北方观众的审美趣味，善于创新的余三胜不断改良所学的东腔、汉调，创出“二黄腔”，戏路日渐宽广，也越来越受观众欢迎，终于在天津站稳脚跟。经过数年努力，他小有积蓄，在天津购置房屋，定居下来。

执掌春台，自成一派

道光十二年（1832），余三胜在北京演出时偶遇同乡，勾起思乡之情。次年，他返回七娘山，将父母和弟弟四胜接到天津。父母相继去世后，余三胜带着专攻净行的弟弟四胜再度进京，重搭三庆班演出。

此时已有不少汉调演员进京演唱，北京观众对汉调由抵制逐渐转为接受，余三胜的汉调恰逢其时。但三庆班原有老生，余三胜无法担任主角，只能演唱配角，难以施展才华。恰在此时，春台班向他邀约，他便改搭春台班。

春台班亦是四大徽班之一，因原老班主、湖北崇阳人米应先病逝，由他人组班，一直不甚景气。余三胜到春台班后，挑起大梁担任主演。有了用武之地的他，不断钻研技艺，将最擅长的“花腔”演唱得余音绕梁，令人痴迷。一次堂会中，一位清廷贝勒独点他的花腔，他连演《取成都》《捉放曹》两曲，喝彩声不断，一炮走红。得到王公大臣的欣



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题款的罗田九资河三胜广场余三胜塑像

赏推崇，余三胜在北京名声大振，不久便担任春台班班主。

一上任，余三胜就主持丰富剧目，开拓戏路。在演唱上，将汉调皮黄与徽调皮黄相结合，吸收昆曲、梆子的演唱特点，创造出抑扬婉转的皮黄唱腔，使原本较为简单的徽调皮黄逐渐丰富，还创制了二黄反调；在念白上，他将汉调基本语音（即所谓湖广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既富于音乐感、悦耳动听，又让北京观众能够听懂。由此，“京剧”这一剧种开始萌芽，并逐步成长发展。

除唱法、念白创新外，余三胜还致力于戏曲的改造与整理。如将净角戏《沙陀国》中的李克用改用本色脸演唱；剔除旧剧目中陈词滥调、污秽下流、诲淫诲盗等糟粕，以清新健康的唱词替代，均被后人奉为范本。

当时对他的评价是：“能于程、张以外，别创一格，以自成一家。每于词句鄙俚之处，腔调不良之点，均能更正而改之，故其当时名声显著……”《梨园旧话》亦称：“余如韦孟之闲适，空山鼓琴，沉思独往，观者如游名园花木翳荟中，如闻幽鸟之一鸣，尘襟为之一涤……”

余三胜相貌清肃，举止典雅，且机智过人，演出时常能即兴发挥、机智救场。一次，他演《上天台》，扮演汉光武帝刘秀，由四名内侍护卫上场。按剧情应左右各站两名内侍，不料内侍站成一边三人、一边一人。余三胜频频以眼色示意，可那名演员惊慌失措，始终未能归位。好在观众沉醉于他的演唱，并未喝倒彩，但余三胜自觉不妥，便在唱完下场时，即兴加唱两句：“这边一个那边三，还须孤王把他搬。”同时挥袖示意，将站错的内侍引下场。这一将错就错，引来满堂欢笑。后来相声《空城计》所采用的相关情节，即来源于此。

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各班须生最著名者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人各有千秋，并称京戏“三鼎甲”，又称“老生三杰”。时人尤重余三胜，京人杨静亭所著《都门杂咏》有《黄腔》一诗云：“时尚黄腔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

另据资料记载，余三胜曾任精忠庙首（即京城戏班总管），被朝廷授予四品供奉职衔。一次进宫为道光帝演出《四郎探母》和《文昭关》，《文昭关》中有一大段二黄三眼，起唱皆为“一轮明月……”。余三胜在唱“一”字时，有十三个迂回婉转的唱腔，如同连续唱出十三个“一”，故名“十三一”，听来荡气回肠，沁人心脾，深受道光帝赞赏，称他为“戏状元”。

成名后的余三胜依然谦和待人，对后辈尤为关爱，出道较晚的程长庚曾得到他多番提携。在《程长庚传》和《大老板程长庚》九集电视剧中，分别有这样的细节：程长庚学戏时常听师傅夸奖余三胜，心中早已引为榜样。进京后，程长庚一度受同行排挤，登台机会少，演出也少有人欣赏。此时已负盛名的余三胜，在程长庚演出时专程到场捧场，带头喝彩，使他逐渐声名鹊起。余三胜还在演唱上多次指点，助其技艺精进。

一次京都某科团拜会上，有显贵欲令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合演《取成都》，角色由三人自行商议。三人中余三胜年最长、成名最早，按理当演主角，他却主动将主要角色让给程、张二人，自己饰演配角。这种呵护新秀的胸襟，令程、张二人感激不尽，受益终生。

余三胜还义授卢胜奎、刘和坤等人技艺，助他们以唱戏安身立命。卢胜奎文笔较好，不仅向余三胜学戏，还与他一同编写剧本。余三胜熟读《三国演义》，卢胜奎所编数十本三国戏，大多是在余三胜指导下完成。刘和坤先学梆子，后改习皮黄，拜余三胜为师后，到山东济南搭高升班演出，行内评价其“唱工做派，深得师传”。

余三胜胸怀宽广，与同行多有交往切磋，如天津名丑刘赶三，以及郎八十、杓子刘、张三元等人。刘赶三祖籍天津，票友出身，自幼爱好看戏唱戏，道光末年一直在天津群雅轩票房习演老生，尤其崇拜余三胜的技艺，凡余三胜到天津演出，他每场必到，日久便想拜师学艺。余三胜见他聪明善言，便带他进京“下海”，并根据其特长，建议他改习丑行，同时介绍他搭入春台班，亲自为其提供演出平台。此后刘赶三声名大噪，在丑行串演其他行当唱段时，常模仿余三胜

《三娘教子》中“小东人”一段，内外行皆称极其传神。

广传薪火，余韵长存

余三胜晚年家道小康，其时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咸丰帝移驾热河，京城繁华暂歇。次年咸丰帝于热河驾崩，京城各戏班一律停演，不少班社被迫解散。直至三年国丧期满，内务府才准令恢复演出。同治二年（1863）十月十六日，各班社重新组班。春台班原班主在禁演期间去世，班主易人；而咸丰初年成立的广和成班新任班主周凤梧（周喜子）邀请余三胜兄弟二人加盟以壮声威，余三胜便与四胜一同离开春台班，加入广和成班。班中还有他的湖北老乡、著名老旦艺人谭志道，其子谭鑫培当时正在学戏，常观摩余三胜演出，仰慕其艺，欲拜入门下。

余三胜时年61岁，正盼有人传承技艺，又见谭鑫培是可塑之才，便有心栽培。谭鑫培拜师后，余三胜将平生得意剧目《当铜卖马》《捉放曹》《桑园寄子》《定军山》等悉数传授，还让谭鑫培在《桑园寄子》中配演娃娃生。谭鑫培平日在台下观摩学习更多，《珠帘寨》《碰碑》《乌龙院》《阳平关》等剧目，皆得余氏精髓，后来均成为其拿手杰作。

同治四年（1865），周凤梧不再担任班主，谭氏父子也离开，加之余四胜想改搭阜成班，余三胜此时精力体力大不如前，演出渐少，民间便有“三胜由来没准常”之说，于是他便依从四胜。

一次阜成班在宣武门外谢公祠堂演出《李陵碑》，原本余三胜不必上场，但主东执意要看他的戏，余三胜只得应允，主演杨继业。演至碰碑倒地时，他突然体力不支，

倒地许久才起身，幸好已近剧终。此后他身体一蹶不振，只得退出舞台。余三胜在天津置有房产，又对天津深有感情，便暂住天津就医。

同治五年（1866）春夏之交，余三胜身体略有好转，应天津一戏班邀请，也为答谢天津戏迷多年支持，又演一场《洪羊洞》。台上他表演卖力，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爆满，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余三胜热泪盈眶，再三谢幕。这是他从家乡罗田到津、京后的最后一次演出。不久，他身体每况愈下，于农历六月十三日晚与世长辞，享年64岁。

余三胜虽逝，余韵长存。今人公认，余三胜对京剧诞生有五大贡献：一是奠定京剧以生为主的角色定位；二是对皮黄声腔曲调的重要改革；三是对汉剧语言的改造，扩大中州韵使用范围，初步建立余氏音韵体系；四是对汉剧剧目加工整理、修改提高，为京剧积累一批优秀剧目；五是祖孙接力，发扬光大，使“汉派”成为京剧主流。

余三胜在京剧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京剧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天津第一代泥塑匠张明山为其塑造《黄鹤楼》中刘备造型泥塑一座，现保存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余三胜也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

王松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罗田县文化馆退休职工

光影作桥，让世界“看见”中国

◇ 袁明辉

人物名片：袁明辉，市政协委员，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顾问和常任评委，俄罗斯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总冠军。

自然摄影带给我的激情，从根本上说源于一种创造——在大自然中守候并等待那个独一无二的机会降临，然后用相机定格那一瞬间。我希望通过镜头表达自然的美，把对生命的理解和创造力用影像传递出去。多年来，我选择不断在国际顶级专业自然摄影比赛中去呈现、去获奖，让拍摄于中国的自然影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让世界看到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成果与诚意。

从工厂到旷野的摄影梦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作为湖北医学院的学生干部，带头响应号召，到祖国最

艰苦的地方参军。父母都是原南海舰队的军医，我出生在海南海口的四二四医院。一岁半时，父母因为工作太忙，便将我送回武汉交由外婆抚养。后来父母从南海舰队复员转业，回到武汉第三制药厂医务室工作，我们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药厂位于郊区，在南湖周边的野地里，青蛙、金龟子、蚱蜢到处都是，我总跟着小伙伴在野地里追逐蝴蝶和蜻蜓，那段无拘无束的时光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幸福的珍藏。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武汉第三制药厂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三班倒的作息，轰鸣的机器声，飞扬的粉尘，日复一日地配料、装箱、上机操作。一天深夜我站在车间里，机器的隆隆巨响仿佛要将一切吞噬，就在那个瞬间，我仿佛一眼就看到了这辈子的尽头，下定决心要改变。

1998年，我通过成人高考考进武汉大学摄影班学习。从1999年到2005年，我利



幼年袁明辉

用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在武汉大学修完了专科和本科的全部课程并拿到了学位。最初我连相机都没有，海鸥相机是找一个朋友借用的。当我第一次端起相机，对准那些小小的昆虫和植物时，心里满是新鲜与好奇。

那个年代，摄影的主流是新闻纪实和沙龙摄影，自然摄影在国内是无人问津的冷门，甚至还没有一个能够为野生动物摄影师提供舞台的摄影比赛。身边的摄影朋友们闲暇时都去接拍商业婚纱和人像，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一到休息日就往野地里跑，去拍花草草、昆虫青蛙。在胶片时代，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就是一场不务正业的挥霍，花着钱干着不赚钱的事。可对我来说，哪怕只是在自然中随意走走，即便不按下快门，也是一种莫大的愉悦。那些与草木虫鱼独处的时光，能让我暂时摆脱俗世的经济压力和生活烦恼。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日子，让我与自然万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隐秘而牢固的情感连接，让我逐渐练就了一双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拍摄时机的眼睛。

那段时间，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我埋头专研微距摄

影，如饥似渴地在国外的摄影网站上浏览，认真学习国际顶尖摄影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和构图技巧，试着把自己放在大师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去体验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感觉。慢慢地，一个梦想在我心里悄悄发芽，我想去敲开那扇门，去获得被国际顶尖自然摄影师视为“自然摄影奥斯卡”的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WPY）的奖项。

2014年10月，我的作品在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的植物真菌组中获奖。这个奖项给了我巨大的激励。恰在此时，公司面临改制，我决心为了心中那个宏大的梦想做一次彻底的断舍离。于是在2015年3月，我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将自己的人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热爱的自然摄影中去。

自然深处感悟生命哲学

在明确了目标之后，我开始以一个职业自然摄影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外出拍摄之前，我会仔细了解天气情况，在心里预设好一整天的行动路线，像一名运动员备战比赛那样，去迎接那充满朝气和未知的拍摄。

深秋，为了拍到植物身上最动人的冰霜，我必须赶在日出之前到达。凌晨四点，整座城市还在沉睡，我已经出发，为的是在气温升高、冰霜融化之前，捕捉到那稍纵即逝的晶莹。寒冬，我在东湖边的一个池塘旁，偶然发现几根干枯的荷秆与它们在水中的倒影，竟然奇妙地构成了一幅素描画，一条鱼的形状。我激动得屏住呼吸，但我发现镜头焦距不够长，角度也不够理想。为了获得那个绝佳的低角度和干净的背景，我卷起裤腿，脱下鞋袜，赤脚踩进了冰冷刺骨的淤泥里，一步一步慢慢挪，直到取景框里呈现出最完美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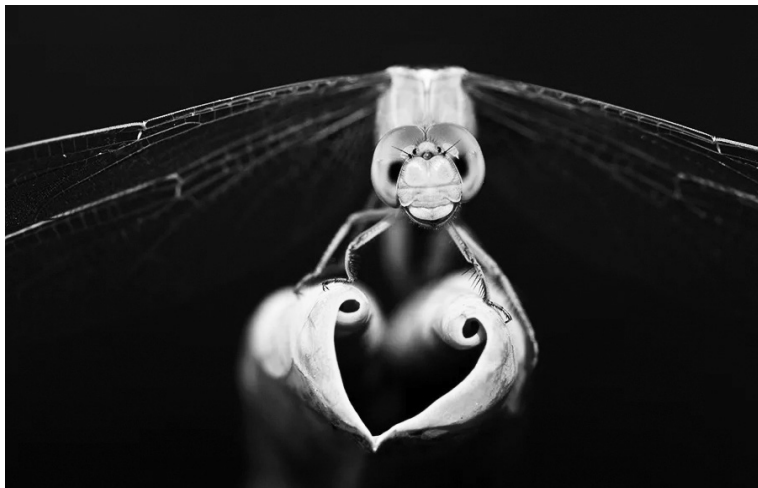
忘我的拍摄状态也曾让我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有一次，为了拍摄一株植物茎秆上栖息的蜻蜓，我双膝跪地，全神贯注拍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裤腿上爬满了蝉虫，瞬间头皮发麻。万幸的是，我习惯在野外将裤脚塞进长筒袜里，把长袖的下摆塞进裤腰，没有给蝉虫留下钻进去的机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持续性地关注自然生态题材，选择一片区域，反复去走，反复去看，等待不同光线的降临，寻找不同角度的可能，让自己对拍摄对象的思考不断更新。这个过程，就像职业运动员日复一日地训练，不断发掘自身的潜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不断精进的状态。这些年来形成的特质，成为我克服一切困难和战胜一切挑战的坚实支撑。

视野的开阔，让我的创作有了更深的维度。作为一个自然的欣赏者，我在摄影中感悟到生命的哲学：生与死、追逐与逃离、孤独与陪伴、顺服与抗争，以及对其他生命的痛苦和欢乐感同身受。这需要耐性，年复一年的日晒雨淋，在孤独的自然摄影之路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获奖只是对辛苦付出的承认，它是自然给予你相对应的礼物。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收到德国国际自然摄影亮点奖创始人玛娜·福尔曼女士代表组委会发来的祝贺邮件。信里，她激动地告诉我，我是这个赛事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因为“袁”和“元”同音，她甚至风趣地说，这是一个中国时代，袁（元）朝的来临。

在这之后的好些年里，我陆续在欧美国家举办的二十多个国际顶级自然摄影赛事



摄影作品《蜻蜓秀爱心》

中获奖，成为了那些大赛历史上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人。参赛十多年，前后算下来，我一共在二十六项国际顶级的专业类自然摄影大赛中，获得了超过二百四十个奖项，成为当时国际上获得专业类自然摄影奖项最多的摄影师。

当我得知自己的作品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八十多个国家展出，并最终被中国国家档案馆永久收藏，作为中国自然摄影作品走向世界的历史见证时，那种欣喜不仅让我看到了未来更广阔的希望，也让我的父母由衷地感到开心与自豪。

自然影像的力量，远不止于奖项和荣誉，很多作品蕴含的情感力量可以唤起生的希望，能治愈人心。一次在德国举办自然摄影赛事的作品巡展后，我收到了一封德国女士的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是一位癌症患者，医院里的化疗令她痛苦万分，几乎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但在慕尼黑的展览上，她看到了我的一幅获奖作品《自然的和声》。这幅作品像音乐、像一种无声的力量进入了她的心灵，那是自然元素与音乐的完



摄影作品《自然的和声》

美融合。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美丽的小生命在生长，在看到我的作品后，她产生了继续活下去的愿望，想看到更多的生命，也想看看明天又会怎样。

让世界感受中国自然之美

2020年10月，武汉刚刚走出疫情的阴霾，我的个人摄影展《重回微观自然》在武汉天地壹方举办。时任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博士和法国驻华大使罗梁一同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向媒体做了郑重推介。罗梁大使在观展过程中，听我细细讲述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拍摄过程，以及我在观察中与那些微小生命产生的情感连接。

走到展厅出口临别时，罗梁大使感慨地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

“我一直以为，我们法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浪漫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中国人才是世界

上最浪漫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到一幅优秀的自然摄影，就是一扇不需要语言的门，它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而纯粹的自然艺术，正在让不同国度的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感受中国的发展与脉动，去看见一个浪漫而富有诗意的中国。

2017年到2025年间，我先后出版了四本关于微距摄影的书。在《小宇宙》和《自然的呢喃》这两本书里，我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寻找拍摄主题的方法，分享了拍摄背后的故事和详尽的技术参数。在书的最后，我还详细列出了国际所有专业类自然摄影大赛的参赛渠道与方式，就是想要为那些渴望走向世界、却苦于缺乏赛事信息渠道的后来者们，递上一份详尽的地图。

我的第三本书《微距生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的国礼书，由中国林业出版社为在武汉召开的湿地大会专门出版发行。当出版社最初与我接洽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能通过自然摄影向全世界展示武汉这座湿地名城的生态名片。这本书不仅记录了那



袁明辉在野外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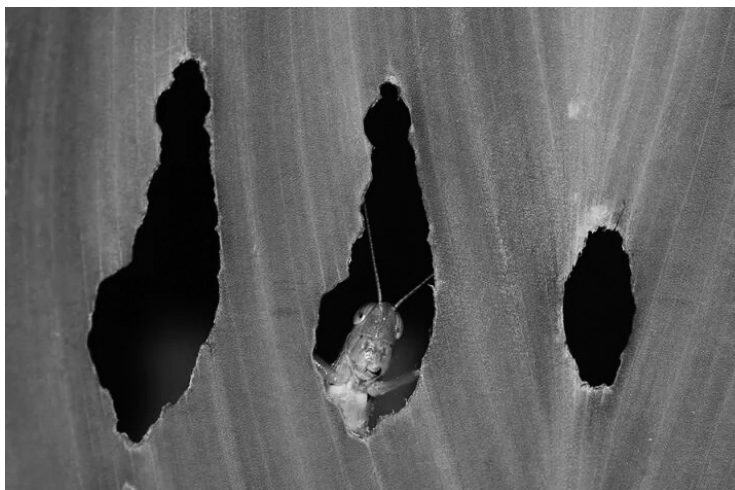
些微小生命的美丽与尊严，也向世界宣介了武汉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扎实成果。

第四本书《近摄自然——湿地的秘密》，则通过英国的出版公司在海外发行，让更多外国读者借由我的微距镜头，深入了解武汉湿地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生物多样性奇迹。

2021年，我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成为第一位以摄影家身份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高度的荣誉感，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我开始走进武汉的一些小学，给孩子们举办公益讲座。我知道对孩子来说，自然摄影的起点是新鲜和好奇，我就从这一点开始对他们做最初的自然摄影启蒙。

我想借由拍摄的那些画面，告诉孩子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破坏自己身边的生态环境，就是伤害自己的未来。我从不奢望每一个听讲的孩子未来都能成为一位职业摄影师，但我真诚地希望当他们长大之后，自然摄影的这颗种子，能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排解内心压力和抑郁情绪的出口，让他们成为内心有爱、善良的人。

2020年5月，我与中国国家地理一道策划了首届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创办这一国际性赛事的初衷，就是希望为中国的摄影师搭建一个与世界顶级同行交流切磋的舞台，让他们不必远渡重洋就能参与国际一流的比拼。为了扩大赛事的国际影响力，让我们在国际自然摄影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亲自出面邀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摄影师朋友们前来参赛、担任评委，为这个属于中国的年赛站台助力。2023年7月，我



摄影作品《捉迷藏》

又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策展了首届西双版纳雨林生态摄影展，同样是希望通过这些凝聚了自然之美的影像，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去守护我们宝贵的绿水青山。

自然之美的影像传播，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惠及那些画面中的动植物本身。保护环境，说到底，就是在感恩自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我坚信，是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恒久的运气，而热爱自然这件事本身，则让我在面对任何困境时，内心都能保持坚强。那些国际自然摄影大赛的奖项和荣耀，让我重新发掘出了自己身上曾被埋没的潜力，而那份源自旷野和微距世界的滋养，更让我的心灵感到充盈和富足。

信用筑基，碳路赋能

◇ 袁 刚

人物名片：袁刚，江岸区政协委员，湖北省信用服务协会副会长，湖北民建双碳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产业专家，中碳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求学到从业，从职场深耕到政协履职，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城市发展共进，在信用服务与绿色低碳领域躬身实践、笃行不怠。回望来路，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每一段经历都饱含收获与感悟。

家风文脉筑人生根基

我出生于湖北荆州石首，家族文脉绵长，家风厚重。先祖袁宗皋为明嘉靖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官清正、忠勤国事，家族世代以“扶日堂”为堂号，御赐对联“调

和鼎鼎公侯府，燮理阴阳宰相家”，忠义诚信的家风代代相传。我自幼受先祖事迹与家风熏陶，深知诚信立身的道理，成为一生的行事准则。

我的求学之路与武汉紧紧相连。2002年，我从中国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四年大学生活，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成长阶段。母校严谨务实的学风、艰苦奋斗的精神、求真务实的态度，深深浸润着我；财经专业学习，让我打下扎实的财务与管理基础，养成严谨细致、逻辑清晰、重视数据的职业素养。“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面对挑战、担当责任的精神支撑。毕业之后，我有幸进入冶金地质总局系统，从秘书起步，在实践中学习、在历练中成长，将母校赋予的知识与品格，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求学时光平淡却厚重，为我此



2022年6月，袁刚（右三）在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后深耕金融、信用、绿色低碳领域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从信用深耕到绿色转型

我的职业历程，也正是中国信用产业从起步到壮大、绿色金融从探索到普及的缩影。大型央企的历练，让我系统掌握企业管理、财务运营、风险管控等实战技能，养成高效务实、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我深知，任何事业都要从基础做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方能行稳致远。

在长期职业发展中，我十分重视与高校、智库的交流合作。作为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后，我多次参与交通大学李孟刚老师相关考察与交流互动，实地考察多个项目，并与多地政府围绕人才培养、轨道交通、校地合作等议题深入座谈，为后续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打下良好基础。这段经历，让我在轨道交通、城市发展、校地合作等方面拓宽了视野，也为后来从事绿色金融、能碳管理、产业服务积累了宝贵经验。2016年，我出任南方租赁总经

理，在金融租赁领域拓宽视野，深刻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更加关注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真切体会到信用在金融活动中的基石作用。

2019年，我响应武汉市“资智回汉”号召，担任中诚信副总裁兼中国诚信中南公司总经理，全面投身信用服务领域，主导华中区域信用布局，深度参与武汉及光谷信用体系

建设，牵头搭建地方信用评价模型，推动政务数据与信用数据融合应用，致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

犹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全程参与武汉“汉融通”企业融资对接服务平台建设，牵头统筹需求设计、技术研发、系统上线与运营迭代；组织公司相关力量紧急攻坚上线抗疫专区、延期续贷、在线贴息等功能，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纾困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我们还创新推出“汉融通指数”，构建多维度企业信用画像，联合银行首创“301”线上贷款模式，实现“3分钟申贷、0人工介入、1秒钟放款”。平台上线以来，服务市场主体超8万户，助力融资超千亿元，兑现贴息超10亿元，成为武汉政银企合作的标志性桥梁。

与此同时，我积极参与区域创新治理，为武汉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2年2月，武昌区域创新发展委员会举办首次座谈活动，我以中诚信集团副总裁身份参会，与科技、金融、文创、人才、智慧城市、商协会等各界代表深入交流。会上，我围绕信用体系建设、金融赋能创新、碳金融与

绿色经济发展等内容分享见解，为武昌区构建全域创新格局、打造环高校经济带、发展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产业提出务实建议。此次座谈拉开了武昌区“筹智、筹力、筹资、筹未来”全域创新工作序幕，也让我更加坚定以专业服务区域创新、以金融支撑产业升级的方向。

作为中诚信集团高管和武大校友，我有幸全程参与并见证集团回馈社会、支持武汉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武汉大学 130 周年校庆捐赠签约仪式上，毛振华董事长向母校捐赠 1 亿元，用于支持数字经济、大数据、绿色可持续等学科建设，以实际行动感恩母校、服务社会。我以中诚信副总裁身份现场见证，毛振华董事长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深深感染着我，也成为我坚守初心、诚信立业、回馈社会的精神指引。

2025 年底，我出任中碳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由中诚信投资集团联合三峡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国开新能源等共同设立，专注绿色金融与碳金融服务。从信用到低碳，赛道转换但初心不变，都是以专业赋能实体经济。我带领团队聚焦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提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规划、碳管理咨询、ESG 评价等服务，助力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

为推动业务落地，2025 年 12 月我带队拜访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龙热情接待。我详细介绍了公司智慧能碳管理平台、碳资产管理、低碳园区咨询、双碳培训、绿色金融服务等核心业务；双方就碳数字化、碳资产运营、人才培养、



2025 年 12 月，带队拜访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

行业标准等领域深入探讨，达成全面合作共识，将携手助力湖北“双碳”战略落地与新能源产业发展。随着在双碳领域的深耕与行业影响力的提升，我也积极参与省级双碳智库建设。

2025 年湖北民建双碳产业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武汉中碳登大厦隆重举行，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府副省长、民建省委主委张文彤等领导出席并为研究院揭牌，我有幸受聘为研究院产业专家，参与政策研究、产学研合作、技术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等工作，为打造“行业一流、全国知名”双碳智库、助力湖北实现“双碳”目标贡献专业力量。

从国企到金融机构，从信用服务到绿色科技，从企业经营到行业智库，我始终坚守专业立身、诚信为本。每一次选择、每一步跨越，都与国家战略、湖北武汉发展同频共振。个人成长离不开时代机遇，企业发展离不开地方沃土，这是我最深切的体会。

专业建言服务武汉发展

2021 年，我当选武汉市江岸区政协委员。此后我始终秉持“立足专业、贴近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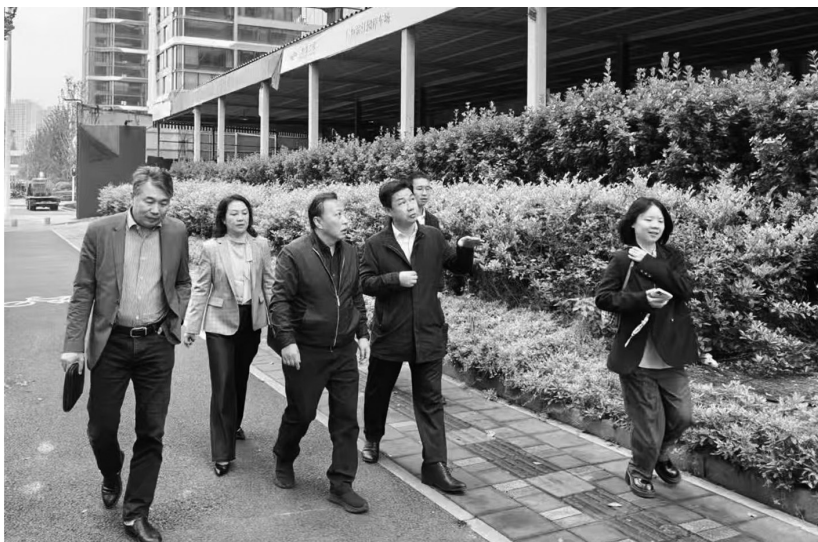
服务发展”的履职理念，把行业观察、企业呼声、基层期盼，转化为精准建言与务实成效。

履职以来，我深入园区、企业、社区走访调研，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营商环境优化、信用体系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针对科创企业数据壁垒、融资不畅等痛点，我多次呼吁加快政务数据开放与信用共享，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与风险分担机制，简化信用贷款流程，扩大信用贷覆盖面，相关建议得到重视并推动政策落地。

作为楚商联合会副秘书长，我积极搭建政企沟通桥梁，推动楚商企业在信用建设、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多次在政商恳谈会、专题协商会上发声，把企业心声带上政协平台，把政策红利传向市场一线。

我十分感谢江岸区政协对企业的关心与支持。江岸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许光辉一行曾莅临座谈交流，看望委员并实地察看仁恒滨江园项目运营情况，我详细汇报了中诚信集团扎根江岸、深耕信用金融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区政协对企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让我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立足主业、深耕江岸，以更大力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心。

在履职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是身份更是使命。既要当好发展的“观察员”，也要当好建言的“参谋员”，更要当好实干的“战斗员”。我始终坚持把履职与主业深度融合，推动信用赋



陪同江岸区政协主席许光辉调研

能实体经济、绿色赋能城市发展，助力武汉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生态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格局。

如今，武汉正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进信用城市、绿色城市建设。作为政协委员，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推动绿色信用、ESG评价、碳信用在武汉落地应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从业二十余载，我始终坚守“专业创造价值，责任成就未来”的信念。我常说，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把专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信用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让绿色成为城市的“鲜明标识”。

扎根武汉二十多年，亲眼见证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亲身参与信用体系建设与绿色低碳转型。这座城市给予我成长的平台、发展的机遇，我理应以实干回报城市、以担当服务人民。

初心铸沥青 实干筑国创

◇ 郝立群（口述） 江志伟（整理）

人物名片：郝立群，湖北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总裁、国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青春韶华到深耕商海，我与国创高科相伴走过整整三十三载。回望这三十余年风雨征程，有创业闯关的艰辛、有技术破局的荣光、有管理深耕的沉淀，更有实业报国、反哺社会的责任担当。每一段征途都浸满汗水，每一次成长都烙印初心，这不仅是国创高科的发展史，也是我个人逐梦奋进的人生路。

干家教干成班级“首富”

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少数民族家庭，骨子里自带蒙古人的豪爽韧劲。幼时随父母迁居武汉铁四院，江城温润的烟火气，又给我的性格添了一份内敛沉稳。

在旁人眼里，我的人生剧本似乎早已写好：安稳读书、顺利毕业，循着父母的足迹进入体制，过一辈子平稳无忧的生活。但我心底，从来不愿安于现状、随波逐流。

1990年，我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更名为武汉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系统的机械专业学习，为我日后涉足沥青设备研发、深耕实业埋下了伏笔。

大学时光里，我不甘只埋头书本，主动走出校园，在青山公园门口、新华书店门前举牌做家教。凭着胆大执着、真诚负责，前来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我顺势牵头登记生源、搭建校内家教中介平台，靠着信息整合和踏实做事，一度成为班级“首富”。我把赚来的钱支持社团活动，心里乐滋滋的。这段自主创业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商业的魅力，也磨练了我的胆识、眼光与统筹能力，为日后投身国创事业积蓄了力量。

毕业踏上创业征途

1993年，我大学毕业。那个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刚过去一年，全国涌动着创业潮。我幸运地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就是现在的国创集团的主要创始人高庆寿先生，我们对行业发展有着相似的判断，对创业创新有着共同的热情，几次深谈后，一拍即合，于当年9月发起组建湖北通发工贸公司。我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营化工产品销售。创业起步便势头向好，公司第一年就创下200万元营业额，这也是我正式扎根国创事业的起点。

上世纪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资料显示，1998—2005年间，每年平均新通车高速公路里程在4500公里以上。但彼时国内改性沥青设备、生产工艺完全被国外巨头垄断，国内无任何技术参照，也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每吨沥青加工费用高达110美元，国家每年耗费巨额外汇，改性沥青国产化已是迫在眉睫的时代使命。

1996年，我们参股成立湖北通发科技开发公司，也就是国创集团的前身。我出任董事、财务副总，分管财务、行政和人事。



1996年，创业初期的国创（左郝立群）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研发成本高昂的困局，我们怀揣产业报国的初心，义无反顾接下改性沥青设备科技攻关的重任。

实业报国是最“硬核”的浪漫

创业初期的技术攻关，远比想象中艰难。没有成熟工艺、没有外援参考，一切都要从零摸索。在交通部公路科研院所和北京市公路局的鼎力支持下，研发团队沉下心来，泡在实验室、守在试验场地，日夜反复配比、调试、论证。

历经一年多日夜鏖战、千百次科学实验，胜利终于如约而至。1996年，我们成功研发出国产改性沥青，通过在基质沥青中掺加热融性高聚物，实现了“成本增1%、寿命翻几番”的行业奇迹，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彻底冲破国外技术垄断的壁垒，圆了国产路面材料自主可控的梦想。

1997年6月参与研发的《LG—8型炼磨式改性沥青生产设备》顺利通过国家有关部委科技成果鉴定，其加工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同年12月荣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国家五部委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1997年北京长安街改造、1999年上海浦东机场高速路刷黑，这两个重量级工程奠定了国创在国内改性沥青行业的地位。2000年，国创承接京珠高速湖北南段改性沥青项目，版图开始向全国铺开。2002年3月，为做强主业、做大产业，国创集团控股成立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公司，我出任副总经理，继续分管财务、人事与行政。



1997年喜迎香港回归，“中华第一街”东西长安街改造工程中采用国创改性沥青

随后我们落子湖北武汉、广西钦州、陕西咸阳、四川成都四大生产基地，年产能突破200万吨，业务覆盖华中、西北、西南广袤大地。湖北本地市场占有率高达70%，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15%，跻身全国高等级公路路面材料核心厂商。

从京沈、京沪、京珠到沪蓉，全国30多个省市、100多个国家级重点基建项目，都留下了国创沥青的坚实印记。以实业赴家国之约，这是属于我们国创人最硬核、最浪漫的坚守。

知识就是“真金白银”

我是学机械出身的，做企业之后发现，光懂技术远远不够。为补齐金融与管理短板，1995年我考入中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进修；2001年前往武汉大学攻读企业管理硕士；2010年、2020年先后走进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深造。在顶尖学府里，系统研习企业管理、战略规划、科技创新与宏观经济，与各地优秀企业家交流碰撞，不仅更新了知识体系，更拓宽了眼界格

局，学会以长远眼光谋企业发展，用科学方法应对市场变局。

我深知企业要长远发展，必须全员成长。2008年，我倡导推动集团建立季度集中学习制度，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科技前沿、历史文化、健康生活等常态化宣讲；同步推行企业内培讲师制度，让国创人走上讲台，分享奋斗故事、业务技能、成长感悟，接地气、聚人心、强素养。

同时我牵头组建财务管理中心学习群，设立周一学习工作例会，线上线下研学财务制度、预算投资、税法政策、诚信责任教育，只要有空我都会全程参与研讨。持之以恒的学习氛围，让集团2010年获评“全省创建学习型组织标兵单位”。

2013年后集团业务版图持续扩张，资金需求成倍增长。我立足所学，提出“以计划为先导、以资金为纽带”的经营理念，科学编制资金计划，提前对接银行融资，推行分步支付模式，避免过度融资、利息过高增加经营成本。

面对经济下行、融资难的困境，我主动研习金融业务，运用银行远期押汇业务，



国创高新湖北黄咸高速项目

利用美元与人民币利息差，一年就为企业节约利息支出 4000 多万元。

有同事开玩笑说：“郝总，你是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真金白银的人。”我说：“不是我能，是知识本身就能。”

“1+1=2”的选人哲学

三十年治企之路，我始终坚守一个理念：制度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基，人才是永续发展的核心，创新是恒久向前的动力。

2000 年，我参加省人事厅首期人事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归来后牵头制定《员工假期规定》《员工考勤制度》《员工奖励制度》，又陆续出台《会计档案管理制度》《财务报销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等十余项规章，搭建起公司制度与内控管理的雏形。

多年来，我坚持对标行业先进企业，不断完善内部治理，覆盖财务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研发管理、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全链条，建成一套规范科学、高效运转的制度体系。2015 年，我主持集团管理制度全面复盘优化，废除过时条款、补齐制度短板、完善新规细则，适配企业多元化发展节奏，推动集团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才能让企业摆脱对个人经验的依赖，实现长期健康发展。尤其把财务视作企业生命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守住财务清晰、内控严格、风险可控的底线。

在人才培养上，我坚持以德为先、以能为重，外引行业精英，内育骨干力量。

针对财务、技术、管理关键岗位，搭建系统化培训体系，给员工成长舞台、发展空间。

2012 年集团公开招聘主管会计，我做主考官，出了一道简单考题：“1+1 等于几？”有人刻意逢迎、有人随意变通，我最终只录取坚持“1+1=2”的应聘者。我始终认为，财务工作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坚守原则、恪守底线，不能圆滑变通。事实也证明，这样选出来的财务人员严谨敬业、独当一面，扛起了岗位重任。

与此同时，我立足自身技术背景，深耕研发创新，主动参与 SBS 改性沥青等新产品技术攻关，先后助力研发出十余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稳固国创行业前三甲地位，为企业稳健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国创的责任与温度

三十年间，国创从未停下升级迭代、多元发展的脚步。2010 年，国创高新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2012 年并购武汉客车厂，布局汽车制造板块；2016 年发起成立国创公益基金，拓展金融投资、教育投资等新兴产业；2017 年完成对深圳云房 100%



国创集团展示厅



国创集团员工总结表彰大会现场（左一郝立群）

股权收购，开启“沥青新材料+房产服务”双主业模式。

如今的国创，已从单一路面材料企业，成长为集道路材料与工程、汽车制造、房地产与酒店管理、金融投资、教育投资等六大板块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建材企业100强、湖北省民营企业100强，业务版图从湖北辐射全国，迈向国际市场。

企业发展壮大，初心从未忘却，“产业报国、反哺社会”是国创三十年不变的使命担当。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我们主动联合武钢、东风等20家企业，率先发起“同舟共济抗危机、齐心协力促发展”共同约定倡议，为全省企业树立示范标杆。

每逢重大灾害，国创从不缺席：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与舟曲泥石流、2013年芦山地震，我们每次都第一时间自发捐款捐物，驰援灾区重建。2016年在省慈善总会指导下，集团成立国创公益基金，我担任基金委副主任，全身心投身公益事业。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集团第一时间捐款1000万元助力防疫防控；组织员

工参与方舱建设、腾退酒店保障、捐赠物资善款。在我的建议下，集团在行业内率先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欠薪，稳住职工岗位，以企业担当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尽责。

多年来，集团积极投身光彩事业、结对共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累计安置各类就业人员2万余人，投入老区建设、希望工程、乡村振兴、灾区重建等公益帮扶资金超1亿元，先后获评湖北省、全国慈善爱心企业。

我个人也有幸担任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工会十三大代表、省中小企业协会理事，荣获全国及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履职期间，我扎根企业实践、深入基层调研，立足行业发展建言献策，把企业家担当、行业诉求与群众期盼融入参政议政，2023年斩获市政协优秀提案奖。

有人说，沥青是工业的“灰色水泥”，朴实、沉默，却承载着万丈繁华。与国创同行的三十三载，我愈发觉得，做人、做企业，就该像沥青一样：经得起高温、扛得住重压、耐得住磨砺。在烈火中改性，在淬炼中成型，最终铺展成一条通往远方的坦途。

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创业的土壤，国家给了实业报国的舞台。如今，国创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从湖北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而我始终记得三十多年前那个在街头举牌做家教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湖北金融先驱徐育华（上）

◇ 麻建雄

徐育华（1880—1952年），号幼丹，报考学校时用名钟英，是一位经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爱国银行家。

徐育华从一个山里伢考秀才、中举人，毕业于湖北高等师范学堂，又选拔公派留学日本，以优异成绩从东京高等商科大学毕业，满怀抱负回到祖国。始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从事财政金融工作，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授，又参与创建湖北省银行，抗日战争开始临危受命任副行长，晚年还聘任为新中国湖北省政府首任参事。

徐育华青少年时代立志读书救国，为追求教育和金融实业救国奋斗一生。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勇赴国难，不计个人得失及身家性命安全，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从山里伢到留日学生

光绪六年（1880年），徐育华出生于湖北崇阳石城镇檀树坳前屋徐家。

崇阳民风淳朴，崇尚教育，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就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开设了算学。徐育华父亲丹城公是晚清秀才，在乡里教私塾。徐育华6岁启蒙，勤奋好学、刻苦自励，善文工诗、书法出众，得到乡亲赞扬和同窗拥戴。

穷教书匠父亲，从早忙到晚也难养活一家人，冬天买不起一双棉鞋给儿子。赤脚上学的艰辛，促进徐育华更加发愤学习。家中常年无钱买肉，一年春节，徐育华只身前往一地主家借肉，费尽功夫也只借得猪头一个。商量好利息后，他拎着猪头回家做年夜饭，结果猪头煮熟还未揭锅，地主旋即上门催债，将已煮熟的猪头索回去。年幼的他叩门作诗“可怜可怜真可怜，煮熟猪头收现钱……”以记其耻激励自己，后来用于教育孙辈。

徐育华取得秀才资格后，在乡试中考中举人，1903年又考上湖北高等师范学堂。

因家境贫寒，进省城上学还得筹借盘缠学费。母亲为了给他缝制一件像样的外衣，只得用一条宝蓝色土布门帘改裁而成。青少年时代的他，就这样走出了峰峦起伏、河溪纵横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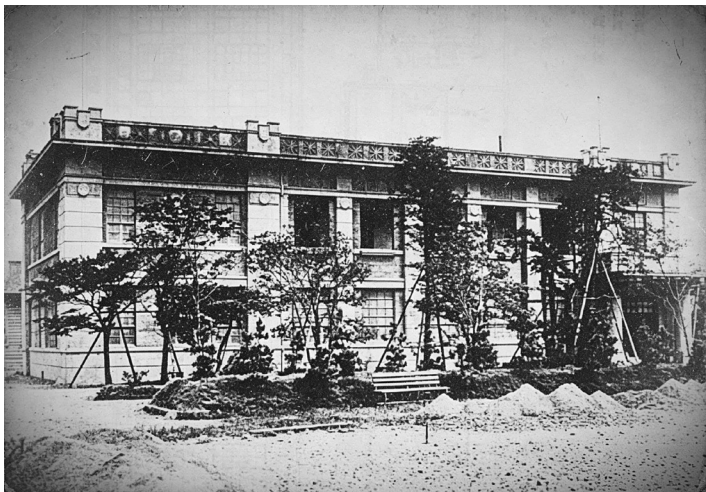
此时正值张之洞督鄂，为推进新式教育，1902年开办湖北师范学堂，亲自担任堂监督。学堂不仅教授传统经史，还设有教育学原理、教育法等师范专业课程，引入算学、外语、格致、体操等西学课程，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之一，黄兴、吴禄贞、李四光等都是该校学生。徐育华在此接受了较系统的教育和新思想，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决计向日本这个新兴的强邻学习，鼓励留学。张之洞迅速响应，他以为游学方向“西洋不如东洋”，1898年开始不断选派优秀学生留日。1905年科举废除，日本又击败沙俄，使“留日热”达到顶峰，徐育华以优异成绩被选派赴日本公费留学。

参加早期同盟会

徐育华先入弘文学院学习，该院是1902—1910年间，日本为留学生设立的最重要预备教育机构之一，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基础学科，为进入专业学习做准备。鲁迅、黄兴、陈独秀、宋教仁、李书城等曾在此就读。徐育华与从湖北黄冈来的李四光同学。

1907年，徐育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商科大学经济专业，该校是日本现顶尖学府一桥大学的前身，是日本第一所官立高等商业



日本东京高等商科大学大楼 1897年摄

学校，以培养“实业界领袖”为宗旨，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及严谨法律意识的商业领导者，而非简单的从业人员。课程体系主要由商学、经济、法律三大支柱构成。徐在此研习西式簿记、会计学及贸易实务，涉猎经济学、财政学以及复杂的国际商法、海商法等。这种跨学科的训练，赋予徐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现代系统化的管理能力。

1907年10月，在清政府民政部为官，曾任内阁中书、直隶提学使的崇阳人刘杼赴日考察，13日上午在东京会见崇阳籍留学生徐育华、蔡默庵、刘念祖、刘绍远、邓海鳌等8人，晤谈良久，在其《蛉洲游记》中有详细记载。据《崇阳县志》介绍，这些学生回国后均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科举制度的废除，留日成为传统教育的替代品，清政府开始从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官员。曾经渴望通过科举一登龙门的读书人，纷纷选择去日本“镀金”，并快速回国就业或填补官位空缺。留学生目标一度功利化，心态浮躁，速成风气盛行。不少自费生，是在私立学校读半年至一年的“速成教育”，专业也集中在法政、教育和军事领域，学习

科技、经济、医学的人相对较少，进入官方大学机构的更是不多。徐育华不为大潮所动，走的是精英留学路线，选择的是冷门经济商科类，清苦自励，发愤学习。

在留日期间，徐深深感受到日本的奋进与中国落后之间的差距，除平日学校功课外，首批加入“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加入者名单刊载于《湖北自治研究会杂志》。该会倡导地方自治，实行宪政，发展教育，试图通过改良革新清朝政治制度。

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达1300人，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位列前茅。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同年全国留日人数8000人左右。这些留日学生，成为早期同盟会的主体力量和核心骨干，占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90%。孙中山在日本，1901年前主要在华侨中活动，以后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近。到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倾向革命的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当孙中山受到大多留日学生的认可和拥戴的时候，他的“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才算真正确立。

徐育华不再满足于学习经济技术，自觉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洗礼。他认为：不论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只要有益于社会和民众，他都积极赞同并力行。他积极参加东京同盟会的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参与发行《湖北学生界》刊物。

徐育华与湖北老乡、同年来日本公费留学的黄侃交往颇多。黄侃也加入了同盟会，时事政治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黄侃日记》记载：“1913年12月29日晚，为徐钟英‘篆扇’，忙到深夜一时，而且很累。”可见他们的交情。黄侃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语言学家、经学大师，与其师章太炎一起称为“章黄学派”。

革命的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为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作出巨大贡献。武昌首义在湖北成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有留日经历的革命党人推波助澜。孙中山曾深情赞誉：“东京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

最早把李斯特经济学说引入中国

李斯特经济学说，是19世纪以来关于国家发展路径和经济本质的一种重要思想体系，为德国、美国、日本乃至韩国、中国等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徐育华1914年发表在《说报》（中华民国进步党留日东京支部1913年创办）上的《论保护政策与国民经济之关系》，为目前发现的最早较详细向中国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文章。“李氏F·List本历史学派，而以生产力为基础，其立论，重国民团体，谓经济上之发展，必经种种之阶级，以经济团体为主脑之，国家有助长发达工业之义务，行教育的关税，以养成国民之生产力，尤为至要云云。是说也，吾人欲为国民养成熟练之技术与联合之生产力，宜拥护将来之大利，而牺牲目前之小利。”

严鹏在《民国时期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在华传播》（《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徐的这段介绍极为简练，但已描绘出李斯特学说的轮廓……比起京师法律学堂经济学笔记，显然要丰富得多。尤为可贵的是，徐已经注意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重视长远发展而非短期目标的战略性，且希望中国采取李斯特主义经济政策。”

徐育华看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处境与李斯特时代的德意志相一致，他又写道：“李氏生于德国产业幼稚之时，痛恨政府误采自由贸易，而提倡保护贸易者，其所处正与我

国现在情形相吻合。吾之草就此篇也，亦犹李氏之志而警告国人者，愿我国民再复思之。”他希望将美、德这两个曾经的后发展国家的崛起经验告诉祖国同胞。

1915年，徐育华以优异成绩从东京高等商科大学毕业回到祖国，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中国银行、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经济学期间，也实践和传播李斯特学说。但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他的影响力有限，其他学者的传播也过于零散。

直到1922年5月，马寅初在北京中国大学商学研究会作了题为《马克思学说与李士特学说：考孰宜于中国》的演讲，才对李斯特学说在华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也扩大了李斯特学说在中国的影响。

徐育华与刘秉麟的人生轨迹有相同之处，刘秉麟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32年也曾在武汉大学任教。徐育华文章对马寅初、刘秉麟是否有影响？没有深入考证。但文章早于二人8年发表，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详细研讨和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仍具历史意义。

参与构建近代银行监管制度

徐育华回国后满怀抱负，但军阀轮番执政，国家满目疮痍。他在北京闯荡14年，从文员做到经理，从教员做到教授，崭露头角。

1915年初，北洋政府举行首次海归留



1915年3月3日《申报》发布留学日本初试考取名单

学生甄拔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员。3月3日《申报》发布初试合格名单，徐育华为商科第二名；3月24日发布复试结果，徐育华为商科甲等。4月8日，教育部又发布关于给考取留学生“士”级待遇的公文。

徐育华被财政部录用，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学习，后派到财政部泉币司任科员。1917年，中国银行大裁员，留用人员名单在8月13日《申报》全部刊发。徐育华留用并提任中国银行总稽核部领组稽核，他主张的李斯特经济学说派上用场，和同事们首次系统构建中国近代银行监管制度，初步确立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机制，为后来的金融管理提供了制度雏形。

1920和1922年，中国银行两度派徐育华去日本神户设经理处，拟任总计、经理。神户作为日本重要港口与金融中心，又是外国租界和国际社区所在地，银行业十分活跃。日本的三井、安田、横滨正金、兴业等主要银行，均在神户设有分行，同时也有英国汇丰等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由于北洋政府的短期行为，神户经理处很难全面开展银行主要业务，但徐育华作为中国最早派出国外开拓海外银行的专员，为日后积累了经验。



徐育华先生中年时期

徐育华殚精竭虑却四处碰壁，对仕途开始淡泊，决心弃官从教。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国家昌盛、民族兴旺之本，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传授给苦难中的莘莘学子，通过教书育人来尽快改变落后中国的面貌。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授多年，讲授经济学、金融学和中国文学等课程，写了大量论著和笔记。

1925年，交通部又委派徐育华赴日本调查航政。参与财政部张作霖执政前后向日本贷款，反用于对抗日本利益，建设沈阳兵工厂，修建奉海、龙通等自主经营的铁路，打破日本对南满铁路的垄断，有助于发展东北。

中西文化的交融，理论实践的结合，使徐育华成长为颇有影响的金融专家。

参与创建湖北银行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湖北籍头面人物居正、张知本、石瑛等人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组成以张知本为主席的湖北

省政府，张难先出任财政厅长。同年，张难先建议筹建湖北省银行（以下简称省行），以谋地方经济之复兴。11月1日，成立了以张难先为首的监理委员会，代表省政府执行监理职权，委员有建设厅长石瑛、民政厅长孙绳等9人。

张难先等人很快想到湖北籍金融专家徐育华，马上诚邀回鄂，任监理委员会秘书兼稽核。在民国，大型银行的监理委员会秘书和稽核职位，其权限和行政级别相当于副行长，主要职责是确保银行发展方向和合规性，拥有独立的监督和直接向行长汇报的渠道，而又由监理会聘任，是监理会、银行之间有效沟通的指定联络人和责任人。

徐育华在监理会的领导下，先后协助唐有壬、魏云千、南夔行长，开始了省行艰难的创建和发展之路。

1928年，武汉的金融基本由近30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垄断，国内银行不过5家。1897年1月成立的湖北官钱局，也在1926年歇业。省行的成立面对强手，必须高起点制定组织大纲和章程。

徐育华参与不断完善监理会组织架构和成员构成，先后增补李基鸿、熊秉坤、彭介石、刘文岛、李书城、喻育之、徐源泉、贺衡夫等政军商界大佬和吴国桢、周苍柏这些留学欧美的经济、金融大家，甚至先后请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夏斗寅和方本仁（代）任委员。

1933年8月，监理会改为理事会和监察人会。1936年8月，理事会又改为董事会和监察人会。从监理会到理事会再到董事会，省行建立和完善现代银行的经营决策机构，只用了8年时间。

1928年11月1日，省行总行在汉口特二区一德街8号举行开幕典礼，同时代理的



1928年11月1日，湖北省銀行開幕紀念、1928年的湖北省銀行總行

省金庫總庫設漢口總行。至1948年2月統計，在全省各市县設分支機構35家，其中分行3家，分別是武昌、老河口和鄂中；支行5家，分別是武穴、宜昌、岳口、恩施和隨縣。此外，辦事處24家，聯合通匯處3家，覆蓋全省各縣。建立區域行制度，各分、支行管理周邊幾個縣辦事處，便於統一調配。

在主要業務方面，設立支持地方農、礦和工商業的多种形式貸款：扶持特產運銷貸款，如鄂中、鄂北的棉花，鄂西的桐油、生漆，鄂東的苧麻，鄂南的茶葉，都是當時湖北的主要出口產品；救災備荒貸款，如1931年長江、漢江大洪災，及時向漢口銀行同業借墊款項，並予以透支款項，全力以赴賑災救災；為災區市民和農民貸款，如備糧備荒、備醫備藥、修築堤壩等。還推出調劑金融貸款、維持典業放款、小本工商貸款，輔助各地小本工商業，安定一般老百姓生活。對於省內較大的工程，如漢口、武昌城市建設，荊江大堤工程，保康修路工程，長渠水利工程等，都給予大額貸款。

此外，協助省府推行計劃教育，讓全省學齡兒童有學上和有升學機會，畢業生有

就業機會。在中等以上學校實施公費制度、考取外省大學生獎學金制度。中等學校校服所需的土布、棉花，也由省行統一採購、平價供給。

1936年4月3日，徐育華又接任總行儲蓄部主任，雷厲風行制定儲蓄部章程，迅速在分行、支行、辦事處成立儲蓄部。一年多時間，武昌、隨縣、樊城、河口、岳口、武穴、沙洋、宜昌、巴東、宜都、恩施、沙市、黃石等分儲蓄部相繼成立，同時在多個分行、支行、辦事處專門設立縣級金庫。

徐育華把省行的儲蓄業務，逐步從城市轉向廣大農村，從面向官紳、工商大戶擴展至普通市民（農民），大力發展特色儲蓄產品引導社會儲蓄意識提高。在他任職期間，開拓經營、恪守信用、攬存有方，使總行儲蓄額達到歷史新高。

麻建雄，武漢市政協第八、九屆委員，
武漢市人大第十一、十二、十三屆代表，
武漢市攝影家協會原主席，漢商集團原總經理

人生如织：我的求学与工作足迹

◇ 刘松余

1964年7月，我从武汉六中毕业参加高考，幸蒙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工程系棉纺专业录取。8月27日晨8时，长江“江顺”轮在武汉关18码头鸣笛启航，高中王老师和我们父母、哥嫂及妹妹齐聚送行，挤在人群中向我挥手告别，殷切的神情至今留在脑海。29日午后，抵上海黄浦江16铺码头，我随迎新校车到延安西路校园入住第5宿舍，心中憧憬未来，开始奋勉前行。

广阔天地别样锤炼

当时的“华纺”是纺织部主管、教育部1960年确定的重点高校（后更名为中国

纺织大学、东华大学），设纺织工程、纺织机械、纺织化学三个系，师生员工4200余人，院长温仰春、党委书记刘光军均为革命老干部。

我们这一届新生，纺织工程系有四个大班。辅导员张镜焯老师宣布由我担任甲班班长，我自知个子瘦小、能力有限，辞而未允而受慰勉，这份信任于今难忘。

开学伊始，留美归国的王仲宜教授为我们指点专业迷津。随后，贺福敏老师在校棉纺工厂讲授《棉纺概论》，言犹在耳。王宠武老师带我们到校机械工厂实习，我亲手制作的那把小巧铁锤，伴随我已60余载。还有唐保宁老师的制图课、大班的高等数学



1969年6月，作者（后排右一）与学友在上海外白渡桥留影

课、分级分班的英语课……老师授课认真，同学听讲用心，学风严谨，井然有序。从夜间紧急集合去西郊拉练，到中午列队高唱学雷锋歌曲前往食堂，再到晚自习灯火通明，那段时光纯洁而充满朝气。

1965年，学校贯彻教学内容“少而精”的方针。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国家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纺织工程系有两个班获准“半工半读”试点。5月17日，我们棉纺641班与机织642班去上海国棉一厂。那里是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地方，拥有“杨富珍小组”这样的全国先进集体。我们分组轮流上理论课，参加车间运转生产或设备维修。

我分配在北纺工厂参加劳动，亲历棉花纺纱现代化生产全流程，见识国产设备和工艺技术

的发展前沿：往复式自动抓包喂棉在清花车间试验；65型新式梳棉机在梳棉车间准备鉴定定型；天轴皮带传动的老式梳棉机，革新斩刀剥棉为罗拉剥棉；并条及粗纱工序精简优化；细纱工序自动落纱机取代手工落纱，国产超大牵伸纺纱的标杆车间正常投产。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学子如鱼得水。

然而，最触动我的是清花车间的劳动艰辛：原棉靠手工铺帘喂入，开清棉排出的粉尘杂屑沉降在地弄里，需人工定期在尘雾弥漫中清理。这种生产方式，使我切身感受到工人师傅的不易，也深刻意识到清花自动除尘攻关的紧迫性。车间生产实践，不仅让我学习了实际技能，更在我心中坚定了“科技报国”的志向。在学军活动中，我们还和工厂民兵同往虹桥机场连队参加训练，演习在炮身绑上机枪打靶，一枪精准“扑住”目标，情景记忆犹新。

国家重视学生体质，将上海地区大学生伙食标准每月增至15.5元，半工半读学生比照发给生活补贴。因父母无固定工资且我未申请助学金，这份关怀对我如雪中送炭。

1966年“文革”爆发，校园风云激荡，正常的教学中断，直到1968年工宣队进校。



1989年10月，作者毕业20周年重返母校

那段时期，男生自购零件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生埋头织毛衣……

1969年盛夏，我们本该毕业分配，但响应号召支援劳动力紧缺的工厂生产。我报名去杨树浦国棉十六厂，顶岗勤工俭学劳动近两个月。年底开始备战疏散，部分师生迁往闵行北桥农村。淮南纺织厂新厂房安装设备时，工宣队抽调半工半读班师生组成“上海安装队”增援。在那里，我们不仅安装机器，还到淮南煤矿乘罐笼下深井，与矿工一起掘进、挖煤，体验了地底深处的艰苦。这一时期，我们未能正常在校园更多汲取知识，但到了广阔天地经受了别样锤炼。

蕲水河畔筑梦山乡

1970年8月，根据“先当普通工人”的分配政策，我被派往湖北蕲春县棉织厂。当地民风淳朴，工厂在县城漕河镇蕲水河畔，备有染坊和百十台铁木布机和针织机生产色织布。室外堆放锈蚀的棉纺并粗机件，系重庆老厂淘汰调拨运回。书记兼厂长事业心极强，希望能自己纺纱以便产品开发。

蕲春盛产苧麻，厂长让我陪同他去株洲苧麻纺织厂考察，见工艺需要先脱胶，流程长、设备多、投资大，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放弃苧麻纺纱想法，要求利用现有的旧机件，设法添置一些设备，自力更生纺棉纱。

刚踏上工作岗位压力如山，但我好似初生牛犊不怕虎，满腔热忱，一身多任：当工人，参加开箱擦锈，识别清理机件；当采购员，背负行囊四处奔走，寻求配套机器和专用工具；当培训员，带领年轻工友外出参观，耐心讲解操作常规；当技术员，统筹业务安排，为工友答疑解惑。在没有技术图纸资料、买不到专业书籍的困境下，搭工棚因陋就简

开工。大家干劲十足，不怕苦累，同心协力，追逐梦想。面对种种艰难，冥冥之中，总似有某种力量在默默护佑、鼎力帮衬。

我独闯九江“寻宝”。在二棉新厂，边参观边记笔记，虚心向老工程师请教，他慷慨赠予闲置的老机器传动图书。在一棉老厂，买到车间刚淘汰的一台旧细纱机，自己分类包装，捆扎中被尖锐的铁丝戳穿手掌，浑然不觉疼痛，直到运回安装完好，才注意到伤口愈合无恙。出差武汉采购，居然在三棉厂仓库找到一台老梳棉机，请师傅来厂包钢丝针布，试车顺利制出棉条。厂长关注工作进展，见梳棉机锡林滚筒笨重，表面针布易损难以搬动，发动职工全靠人力抬进了新建工房。

采购员王仁富师傅突发脑溢血，我协助紧急送医时，在他住室中发现一套《棉纺清梳并粗细系列专门工艺学》（纺织工业出版社1956年版），实乃如获至宝。这套书分工序编写，各分上下两册，详叙老机器工艺、安装、保全、检修，内容丰富具体，极其适用。由于无法购置开清棉设备，买来简易轧花机变通试用，我留下《清棉专门工艺学》重点攻关，其余按工友负责的设备分发，破解燃眉之急。这套“宝典”帮我们在实践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让我在磨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1972年初秋，在远离县城的芝麻山新工房，我们终于实现了机器纺纱的心愿，还试织了棉毯。厂长带上自纺的棉纱向县计委汇报，计委领导拿到县礼堂大会报喜，备受瞩目。可是，由于国家对棉花统购统销，设备与资金也没有计划安排，我们厂终究无法延续生产。那激情燃烧的年华，虽未结出期待的产业之果，却留下了砥砺前行的铭心印记。

多岗历练迎接挑战

1972年6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武汉宣讲“优选法”，我正因公出差在汉口，有缘在江汉工人文化宫聆听报告。湖北各地相继设立“推优办”，全省掀起推广应用热潮。8月底，经县轻纺局推荐，我调至蕲春县工交办公室，专事推广“优选法”。主办专刊，印制资料，着力普及宣传；深入厂矿及师范学校，召开大会讲解“0.618法”；到现场进行生产应用引导，尽心尽力取得实用成效。

1973年10月，黄冈地区拟建绢纺厂，我借调至此作为甲方人员，协同刚组建的湖北省轻工设计院赴上海、浙江调研。在做好筹建方案后，项目因故缓建，但在此工作过程中，探究新事物，应用新技术，让我对基建工程设计心生向往。

在县工交办工作三年，忙季下乡支农收



1975年，作者（右三）与蕲春县工交办同事合影

割，日常随领导蹲点县农机厂、化肥厂，推革新，促改造，参加车间劳动，尽力调查研究。执笔拟文撰稿，报道工交系统英模事迹，宣传“学大庆、赶先进”典型。

如果说，在蕲春县棉织厂的摸爬滚打，让我操作了“点”上的具体技艺；那么，调入县工交办，将我推向了“面”上的宏观视野。正是这种从单一技术活动向综合管理的转变，让我深切感到：解决复杂问题往往不能仅靠专业深度，更需依赖知识广度。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写道：“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钝。”他还引用泰勒的话指出：“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这一段机关工作经历，帮助我以较宏观的思维看待分析事物，养成科技和人文领域皆钻研的习惯，惠及提升求真务实、综合研判的处事能力，可谓终生受益。

1975年10月，怀抱致力于专业技术的职志，我请调至武汉市第五棉纺织厂（原武昌震寰纱厂）生产技术室。不久，下放车间的科室人员陆续返回厂部机关，一线生产岗位缺人。为了能深入现场脚踏实地工作，我决定逆向申请，补缺到生产车间，亲友对我私语觉得不可思议。1977年恢复高考，贺福敏老师知晓我申请返



1994年11月，作者（右一）参加宜昌聚酯工程时与外商交流

母校进修未果，悉心为我寄送最新棉纺专业各科教学计划，鼓励我在实践中“缺啥补啥”。刘光军老书记亦予以关怀，嘱我深入基层勤学苦练干出实绩。

投身生产一线后，我尽力改善车间工人的工作条件，针对薄弱环节主办技术讲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减少纺纱断头措施，满足工人的应知应会需求，同时受聘兼任厂技校教师授课。承担老机器改造与技术革新任务，整顿提升设备完好率，降低生产消耗，提高生产效率。作为细纱设备组长，代表厂参加全市行业专项检查及本省有关设备管理条例的制定。

在大企业工作的四年里，经过生产一线的磨砺，业务技能向专深发展，管理知识紧贴实际应用，这不仅为职业生涯夯实了基础，也为迎接新的挑战创造了条件。

转型设计奋力向上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纺织工业迎来发展黄金期。7月，随着轻工和纺织

行业分开管理，我调至筹建中的湖北纺织（建筑）设计院。组建之初，技术骨干多为原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下放湖北后调入省轻工设计院的人员，其中不乏共同参与过黄冈绢纺厂调研的老相识。通过研读基本建设法规和设计技术标准，我以多年积累的工厂实践经验为基础，在中央单位老骨干的引领下，先期参与完成福建长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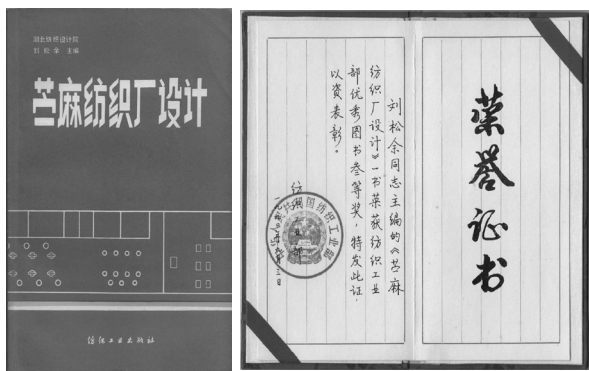
湖北麻城棉纺厂的设计和武汉纺织大学的初期建设规划，较快适应了新环境。

1980年前后，全国苧麻增产库存积压，国务院发文要求加强加工与管理，解决产销矛盾。我院设计在建的岳阳棉纺织厂拟改建为洞庭苧麻纺织厂，亟待重新设计，而院内苧麻纺工艺人员和苧麻技术资料空缺，尚属无人涉足的处女地。面对挑战，我欣然服从分配，决心奋力拼搏攻坚克难。

“学林探路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如饥似渴刻苦钻研，博采众长请教行家，融合提炼构思方案。1980年12月2日下午，由于夜以继日工作过度劳累，我突然晕倒在湖南沅江县招待所，幸被友人及时发现送医，避免了意外发生。在团队通力合作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顺利完成多项新建与转产技改工程设计，不仅丰富了本院技术储备，也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投产后获湖北省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诚如维纳《控制论》所言：“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

为适应苧麻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结合设计实践中的感悟，我于1983年前后撰文，投寄《纺织学报》《苧麻纺织科技》《湖北科技情报》等期刊交流，引起行业关注。由于国内一度兴起“苧麻热”，新厂建设急需辅导而学校教材还是空白，我于1984年8月申请立项主编《苧麻纺织厂设计》，得到纺织工业部生产司、出版社及本院领导和团队的大力支持。经过总结工程设计获奖实例与工厂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日常工作赴湖南、广东、广西、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生产现场或科研院所考察调研，利用两年工余时间完成书稿。

1987年4月，《苧麻纺织厂设计》正式出版。其后，工程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启动，未曾料到我的业绩考核符合破格晋升条件，成为当时省内行业最年轻的高级职称获得者。拙著1988年12月再版发行，并由母校中国纺织大学等多所高校选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1990年9月获纺织工业部优秀图书三等奖，1998年2月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苧麻纺织厂设计》获纺织工业部优秀图书奖

之后，我曾受任高级职称评委，参与本省行业评审工作。应武汉纺织大学之邀，为毕业生作“德才兼备”主题讲座。在本院



荆楚文库《刘凤章集》与新加坡版《刘氏宗谱》

负责技术管理期间，与同事赴欧洲、非洲考察，圆满完成涉外工程任务。退休后，继续勉力文史方面研习，投稿刊载于相关杂志；续纂《刘氏宗谱》在新加坡出版，并整理我族先贤遗著《刘凤章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纳入“荆楚文库丛书”面世，以赓续华夏文脉。

回首我大学求学与职场工作之路，适逢特殊时期至改革开放，顺时施宜，自强不息。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缩影。人生如织，经纬交错。耄耋之年，谨冀以时代变局中的个人笃行足迹，化作一丝微光，与大家分享共勉。惟愿来者不负韶华，匠心织就锦绣华章。

刘松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湖北纺织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

王扶林在武汉讲述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

◇ 王扶林（口述） 马先松（整理）

前记：最近，我偶然翻出王扶林导演来武汉讲述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拍摄经过的录音。那是 1987 年春，《红楼梦》一经央视播出，很快在武汉青年中形成一股“《红楼梦》热”。团市委为引导青年更好地理解这部电视剧，特邀王扶林先生来汉，在硚口区区委礼堂举办讲座，全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有关这次讲座的资料，网上所见也是王扶林先生在不同场合接受访谈的片段。为此，特将录音整理出来并加小标题，留存一段史料。

我是 1979 年产生拍《红楼梦》想法的，当时很多人谈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但不知道中国的曹雪芹，有所大学的中文系只有一个人看过《红楼梦》。曹雪芹的著作绝不逊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四大名著之首，是“国宝”。中央电视台有责任把这部小说普及给中国人民，这是我们这一代导演的责任和使命。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英国，学习电视连续剧的创作，看人家是怎样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的。

1981 年开始征求红学家的意见，拜访吴世昌等一批中国老红学家，得到“红学会”的全力支持，决定由电视剧制作中心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我任导演，10 月在座谈会上定下来。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我本人对红学没有研究，但知道它的价值，办法只有一个——读书，向电视台领导要求，关门读书一年。电视台领导同意，让我一年读完《红楼梦》。当时，很多问题学术界都还在争论中，越读越感到拍这部剧的难度越大，但又必须做，能打 60 分就满意了。这次到武汉就是来听取观众反应的。

全国寻觅“林妹妹”“宝哥哥”

最难的是选演员。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林妹妹、宝哥哥。当时有红学家给我们泼冷水，说“贾宝玉还没生下来呢！”意思是说，贾宝玉是曹雪芹笔下的理想人物，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演员，“如果《红楼梦》拍不成就是因为没有找到贾宝玉”。我不相信偌大个中国，找不出一个演贾宝玉的人来。

林黛玉进贾府时年龄是多大？据推算应是13岁，找个六年级小学生来演行吗？找个新秀如方舒也不行，新秀男的一般高1米77，女的一般高1米63，开玩笑能行吗？我把个头限制在宝玉不超过1米67，黛玉不超过1米63，年龄在17岁左右。

第一个给我来信的是晓旭，她说“我想演黛玉，别人都说我像林黛玉”，有照片。我说“来看看，选中就报销路费，选不上自掏腰包”。她来了，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房间里，我们膝盖对着膝盖谈，我问她有多重，她说80斤。问她学没学过写诗，她拿出一首自己写的诗，写得不错。我觉得一个17岁的姑娘要有诗人、才女的气质，缺点是外形不太美（鼻子）。我说“现在不能定，回去等通知吧”。一年后，她才接到参加训练班的通知。

找贾宝玉的演员更麻烦，派了几个组到全国各地去挑，中青报、广播电视报登广告，一万多人中没选中一个。到成都选演员时，一个偶然机会，有人提到峨影厂的欧阳奋强很像，便给他留了个通知。起初他很犹豫，后来还是来了，穿个背心，趿个拖鞋，灰头土脸地骑个自行车，但一看不像流氓。他娃娃脸，大眼睛圆圆的，在川剧院学过一年，拍过电视剧《虹》《梁小燕》。我想虽还未成材，但总还有些功底，1米66的个头，17岁，很纯真，有基础，当场请他到北京试镜头。

来演《红楼梦》的人，有营业员、端盘子的，有在校大中学生，有跳舞的……专家不看好，甚至说“找这帮人演《红楼梦》是开玩笑”。有人问他们：看过《红楼梦》吗？回答说“看过小人书。”我想，从不懂到懂是一般规律，红学家不也是从不懂到懂的嘛，可他们能演吗？八十年代的青年就那



著名导演王扶林

么笨？《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名著，除了艺术性就是它的群众性，不能把《红楼梦》当成某些人的私有财产，加以神秘化。有些议论如果是出于对名著爱护可以接受，如要我罢休不可能。

我请人给演员们讲课，为他们创造读书条件。演王熙凤的邓婕，原是川剧跑龙套的，如果没有出演凤姐的话，可能还在跑龙套。我选演员的要求是三个字：一是纯，二是真，三是懂，有吸引力，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他们尽管没有演出经验和技巧，但并非是不可造就的。技巧可以提高，没有上面那三个字，再高的技巧也不要。

开头半年的确很难。贾宝玉讲故事的那一节拍了一下午，几十遍还不行，管灯光的都发火了。宝钗说冷香丸那一段，说了很长时间也说不好。因此，电视台下决心办培训学习班。

开始，大家有种神秘感。举行开班典礼时，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昆仑（著名红学家）来了。听说培训演员，是自己找来的，开始还找错了地方，80多岁，是两个人扶上主席台的，坐了一刻钟，这就够了，对学员鼓舞很大。周汝昌、吴祖光、王朝闻都讲了话，给予很大期望。

进培训班的人，我认为可以在“荣国府”找到差事，但究竟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人的性格是变化的、多面的。王熙凤有狠毒的一面，也有可怜的一面。林黛玉尖酸刻薄，但忠于爱情，执着；体弱多病，但好玩好动。演员每天6点半起床开始形体训练，洗脸吃饭后听课，还要学琴棋书画，下午练习表演。自己想演什么自己挑，通过录像大家评论，慢慢就可看出谁能演什么角色了。经过三轮，3个月后结业那天基本定下来。后来又办第二期，主要是角色训练，为角色写自传，这是最困难的，也是非走不可的一条路。

3年走了200多个取景点

缺资金，没场地，少职员，是拍《红楼梦》的又一难。可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拍电视剧的摄影棚都没有。那时流行一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就是按这个拍《红楼梦》的。比如美工组，就是从买锤子、剪子开始的，白手起家。

为解决拍摄场地问题，我去找工程兵领导，借给我们一块干休所空地，改造成摄影棚，为贾母、王夫人盖房子。拍《红楼梦》必须有典型的环境，没有“大观园”不行，请台领导联系宣武区，给了块地皮建“大观园”，北京市委、市政府很支持，1985年7月第一期工程完成。此外，还需有皇家气派的“宁荣二府”。上海建的“荣国府”是按旅游要求建的，我们又在河北正定建“宁荣二府”和“红楼一条街”，是按小说的内容要求建的。建好后，不仅满足了拍摄电视剧的需要，而且成了著名旅游景点，“大观园”一张门票2元，每天接待2万人。

《红楼梦》电视剧演员和工作人员150



王扶林给林黛玉讲戏

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想演戏的人多，但职员来源困难。中央电视台很多人不愿进剧组，一是3年时间太长，二是觉得是是非之地，担心砸锅。有的估计某剧会出国去拍，就主动去另外剧组了。参加《红楼梦》剧拍摄的，中央台只有8人，这8人团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人。

剧组绝大多数是青年男女，情窦初开，如果在台上哥哥妹妹，台下卿卿我我，出了问题怎么办？文艺界这种事是有的。对这支队伍的管理难度大，一开始就要抓紧，选人、留人、管人、教育人，一点都不能松。

有位演员原是餐厅服务员，自己坐车来，超短裙，头发很特别，穿得花花绿绿，我没要，但她就是赖着不走，见人就哭。一天台长来剧组，她当面又哭又闹，只好答应她留下来旁听。试演练习中，发现她会搭戏，全身透出一股俗气，便要她演赵姨娘一角，有点才能，演得可以。后来发现她每天车接车送，身上有了外汇券，社会上也传言剧组某人和外国人曾被公安部门扣留。我便严厉批评她，坚决不要了，宁可把已拍的毁掉，也不能影响《红楼梦》的名声。

法制报一名记者，本是来剧组找风流韵事的，经过几天了解，他写的主题变为“艰

苦奋斗”了，在《追求》杂志上报道剧组青年演员克服困难拍戏的事迹。他说：“看来，光抓艺术是不行的，这个剧组之所以没有作风、贪腐问题，思想引导是关键。”

电视剧组不但要拍戏，还要培养一批年轻演职员，除了严格管理，我十分注重以身作则，不喝酒，不抽烟，在市内不坐小车，这恐怕是在屏幕上看不到的。每天拍完戏我回到房间，把门一关，思考下一段拍摄，无论是谁，一律不接待。

剧组拍摄任务紧，条件差，每个演职员为着同一目标尽心努力。拍摄地多，场景多，剧组走了全国10个省41个地区200多个取景点，一万多个镜头。仅“元妃省亲”一场，就先后在北京、上海、河北、扬州等5个地方拍了124个场景，不如此，气氛就出不来。“探春远嫁”那条船是旧军舰改的，花了一万多元。夏天风浪大，演员晕了倒了，爬起来再演。在蓬莱，船不能靠岸，只能在海上演。“出殡”那场戏中的纸人纸马，是一位84岁老师傅和3个同事一个一个地扎了一年。他说：“我见过的，从吴佩孚以来是场面最大最气派的。”

剧组就是这样靠自己的力量，既满足了拍摄需求，又节省了经费。

忠于原著又注重再创作

从文字表现到影视表演是一种飞跃，必须经过艺术再创造。如果说《红楼梦》的拍摄过程是一个再创作过程，我要真心地感谢剧组全体演职员的艰辛劳动。

《红楼梦》编导组集中了周汝昌、王蒙、曹禺、沈从文等多位红学家、文学家参与创作。该剧前29集基本忠实于曹雪芹原著前80回，后7集主体剧情仍采用程高本后40



王扶林与欧阳奋强

回，但舍弃了小团圆的结局，并根据曹雪芹前80回留下的“蛛丝马迹”和红学探佚学的研究成果重新创作，重新构思结局。该剧播出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重播千余次，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些艺术问题的处理，怎么看？

对林黛玉的演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自舞台上林黛玉以来，已是十几个林黛玉了，这个是最好的；也有的说“不能容忍”。

谈谈我的看法。林黛玉与一般少女不同，如是温和驯良，大家都喜欢，可那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崔莺莺。曹雪芹写出了特有的林黛玉：有才气，对爱情执着，敢于追求；但另一面由于自身处境，性格上有缺点，动不动闹小性子，说话尖刻等。如赵姨娘派人送花，她问“是不是人家挑剩的”，可以这样想但不宜这样说，其实这种猜疑也是无根据的。再如，和大家一起看戏，动辄“拂袖而去”。曹雪芹把两个方面糅合在一起，不能舍弃一面保留一面。有人说，林黛玉不美，她的鼻子太高，声音有点沙哑，这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在灯光下，有些镜头是很美的。

怎样把缺点变成特点？周信芳，哑嗓子，靠奋斗创造了哑音唱法。程砚秋嗓子也不好，创造了一种悲腔。我对小陈说：“你鼻子不好，演好了，就变成特点。如果将来有个塌鼻子演林黛玉，就会有人说不像，只有你才像。”

对贾宝玉，反应基本是好的。历史上演宝玉的都是女的，这次是创举。一个男演员在外地拍片，上男厕所时有人说他是女的，不让他进，这就对了。他是男青年却有脂粉气，不足的是书卷气不多。

对邓婕演的王熙凤，著名红学家李希凡评价“光彩照人，不愧为表演艺术家”。其实，确定邓婕饰演王熙凤，不少人反对甚至排挤。有人公开提出她1.55米的个子太矮，不能担当荣国府主管一角。邓婕不爱打扮，爱钻研，从形象、语言、动作上去全面考虑，是我力主她上的，效果出奇的好。至于个头矮问题，在拍摄中穿高底鞋、尽量用半身摄影相等来解决。

对刘姥姥、贾母的扮演者，专家不满意，群众却喜欢。演员组与观众见面，观众要求第一个见的是刘姥姥的扮演者。也有认为，贾母威严不够，刘姥姥太俗了。

正当剧组为《红楼梦》音乐及插曲发愁的时候，王立平来到剧组毛遂自荐。他说：“我40多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我要把我的毕生精力献给《红楼梦》。”他拿出《枉凝眉》给我听，说：“如果看得上就把全剧的音乐、插曲交给我，看不上我立马走人。”我说：“这么大的量一人作得过来吗？”他满有信心地回答：“你拍到哪我作到哪。”

有的人知道我准备将作曲交王立平时，给我写信说他是写通俗歌曲的，对为《红楼梦》写曲表示怀疑。还有的甚至因此怀疑我“有没有能力当《红楼梦》导演”。其实，

王立平已经写过《太阳岛上》《大海啊故乡》《少林寺》，我把他写的《枉凝眉》给红学家听，得到高度赞赏，我放下心来。王立平加盟剧组，4年时间费了不少精力，也流了不少眼泪，不仅为全剧谱曲，而且写了全部13首插曲，首首经典，用音乐凝固了《红楼梦》。

我对全剧内容的把握，根据主题和剧情发展，考虑电视剧的特点，该删的删，该改的改。

“调包计”为什么改？有人批评说，“调包计”改了后不如原著起伏跌宕和感人，我承认。但我要告诉同志们，这是主题的要求。我们总的要求是忠于原著，即按照曹雪芹前80回确定的主题，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线索，黛玉香消玉殒，宝玉出家而去，死的死，抓的抓，散的散，贾、王、史、薛四大家衰落，揭示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而高鹗的后40回续作，却偏离了曹雪芹的初衷，“兰桂齐芳”大团圆。修改后突出悲剧色彩，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还原“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结局。

为什么把“太虚幻境”删掉？说实在，我也喜欢这一节，仙境里有歌有舞，很适合电视表现。但幻境的核心是让警幻仙姑带着判词让宝玉觉悟，这是一种先验论。人未死，各种结局都告知了，这是不合理的。仅有轻歌曼舞也是不行的，所以全部删去。

《红楼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虚实结合的处理有些地方太实。再如观众批评的神韵不够，体现诗情画意不足等。

马先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竹枝词中的汉口城市图景

◇ 黄学文

19世纪的汉口，是一座沿江而兴、因水成市的码头城市。人们常说，汉口是九省通衢、百业汇集的大埠场，但若仅仅用“商业都市”来概括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诗人叶调元笔下的汉口，远不止于繁华二字。他写街市、写行脚人，写船头、写戏子，还有庙口愿戏、纸钱火光，也写三岔口的乞丐、巷弄中的吊楼、除夕夜里的梦兆。他用近三百首竹枝词，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份细密的日常图谱，也为我们今日回望汉口，提供了一份可以穿越时空的依据。

竹枝词，本为唐代以来流行于巴蜀、荆楚一带的民间曲调，专写风土人情，音节平易、语言生动。到了清代，成为一种书写地方民众生活的诗体。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展开。他不是为了歌功颂德，也不是为了记录政绩，而是选择站在街角、巷尾、茶楼、码头，以民众的眼睛看世界。

这些诗，有的长于记事，如“三岔路口乞人拦”，写的是乞丐如何在路口拦人施舍，谁施钱谁脱身；有的专写节日，如“龙船经费有标船”，一条龙船的开销从何而来，人人竞标，节日即是竞场；也有的抒写感官印象，如“芝麻撒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一声锣响，一口热甜，就把冬日街头勾勒出来了。这些诗，是来自码头、街市与庙口的声音，说的是今日之人或许难以完全理解的词语，但描写的场景、情绪与感受，却仍能唤起对城市的深刻共鸣。如有人说，历史可以从大处写，也可以从街边写；城市可以从地图看，也可以从诗里看。诗里的汉口，是一座被行走、被观看、被祭祀、被记得的城市。

叶调元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城市蓝图，但他给了我们一个更鲜活的城市记忆，那里有日出时分扛活的吆喝，有午后茶楼的脚步，有庙前戏台下孩童的吵闹，也有大水过后丈量观音阁柱子的焦灼与愁绪。这，就



《汉口竹枝词校注》

是叶调元带我们走入的汉口。它不是历史课本上的汉口，而是民众生活过的汉口。

街头巷尾的日子

在汉口，认路有时不靠街名，而靠人。如挑水的，一清早就挑着空桶穿街过巷，一直到河边——只要跟着他走，保准不迷路。叶调元说得好：“但随水桶空挑者，直到河边是正街。”这句话，不只是在说一条路怎么走，更道出城市的空间秩序，不是由地图制定，而是被人们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这些挑水、扛活、撑船、卖小吃的人，每日往返于巷弄与码头之间，也用身体行动来记忆、塑造街头的路线。诗中“横冲直撞途人避”的码头工、“五文便许大江过”的摆渡人，他们在城市中穿行奔走，每一寸街道都有了生气。

而另一种汉口的秩序，则是从“仁义司”“礼智司”这些儒家德目的坊名中长出来的。汉口被清晰地划分为四坊二司，上街是居仁由义、下街是循礼大智。这些名字不只是统治语言，更是伦理象征。权力在这里

不是硬性的，而是用“德”的语言来代表街区，使每一个坊名都有了治理的涵义。

就连码头的搬运行也有自己的边界。婚丧嫁娶要雇人抬东西，若不跟“本码头”商量，立刻就会起冲突。这些分区不写在告示牌上，却早已深入每个行业的日常分工与潜规则中。正如诗中所言：“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汉口。它不只是舟车交会的枢纽，更是一个被民众脚步磨出来的街市网络，一个被坊名、规矩、行为所共同维持的秩序场。

茶楼庙口的风景

说起汉口的“城市记忆”，若没有庙口戏台的锣鼓声、后湖茶楼的喧嚣声，以及会馆梁柱下的乡音，这座城便少了灵魂。

沈家庙，是汉口人愿戏还神的重要所在。庙供关帝，每逢香期或求神应验，便有信士“押银”设戏酬神。诗里说得清楚：“沈家庙里戏酬神，一节入官二百文。求福人多还愿众，戏台押得一包银。”那“一包银”，往往高达五百两，可见酬神之诚，也见庙戏之盛。戏班、信徒、看客三方，构成了庙前热闹的人声地景。这里不是正规的戏院，而是民间自组的临时剧场。搭台、挂红、放炮，场地或为庙埕或为空地，戏码不求雅正，求的是热闹与诚心。看戏者未必懂腔调，但懂得敬神、懂得在“一回吹打一回鞭”的节奏中，藏着民众求财的渴望。

另一头的会馆，则是异乡人在汉口筑起的“原乡记忆”。万寿宫、阳明书院，皆以宏丽闻名。诗中说：“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阳明院的白石梁柱、万寿宫的青瓦浮描，不只是建筑美学，更是一种

乡愁的实体化。每一座会馆，都是商帮的象征与聚会之所，也是一种空间里的身份认同。

信仰、乡谊之余，汉口人也懂得给自己留点闲气。后湖茶楼，便是这样的所在。两层楼房，“涌金泉”居高临下，成为品茗与望景的首选。诗中描写道：“要吃清茶兼望远，楼高须上涌金泉。”这一处，不仅是感官的喘息场，更是心灵的落脚地。摩肩接踵之下，是另一种城市秩序的浮现：人来人往，说书卖艺，皆在此间流动。

沈家庙的愿戏，是与神明对话的场景；会馆的石梁与青瓦，是对故土的想象；而后湖茶楼，则是一座城市在喧嚣中寻求喘息与节奏的方式。它们也许早已不见于今日，但在诗里，永远熙攘如初。



戏子乞丐的身影

在叶调元笔下，戏子、乞丐这些边缘身影，在街头巷尾用身体说话、以行动落字，书写出一个另类的汉口故事。

戏班，是民众娱乐的核心。草台戏、子台戏、愿戏、杂耍轮番上演，成为城市中最热闹的移动场景。诗中写道：“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戏子在庙埕临时搭棚，演的不是官场忠烈，而是梁山好汉与风月私情；观众不是读书士子，而是街头贩夫与掌柜伙计，戏在，市集即成。“河岸宽平好戏场，子台齐搭草台旁。浓妆岂为梨园到，半倩郎看半看郎。”子台原为女子观戏之所，后来成了妓女登场竞艳之场。戏未开，妆已浓，谁看谁，谁被看，城里的风月与戏班一样，流动不定，界限模糊。

乞丐，是最边缘却也最能占位的群体。“三岔路口乞人拦，追索钱文不放宽。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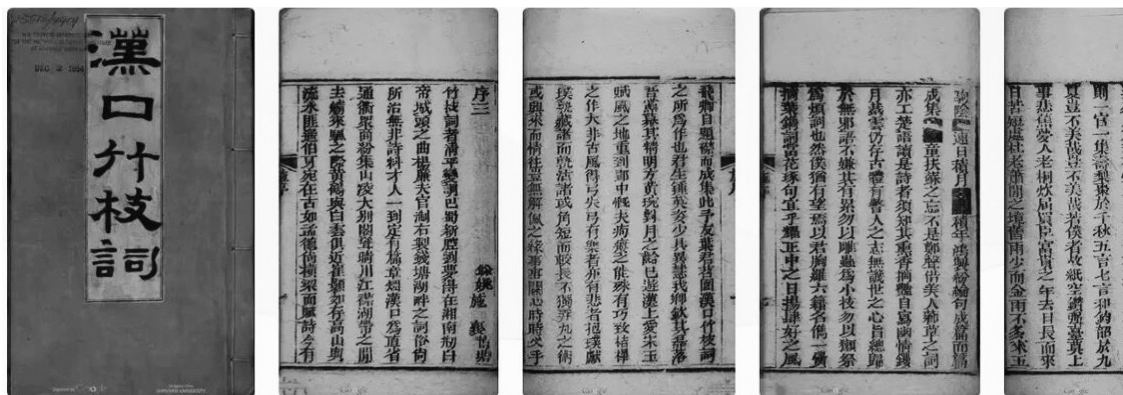
一人群丐集，施钱容易脱身难。”三岔口是城市流动的要地，也是乞丐部署的舞台。他们不等施舍，而是创造阻力、施加压力，用行动逼迫城市记住他们的存在。还有那些吊楼下模仿乌龟、春牛的童乞、“口占对子”的文乞，他们以身体作剧场、以技巧博眼球，是城市表演者，也是空间操作者，刻下一道道活的记号。

这些戏子、乞丐的脚步与呼喊、眼神与装扮、话术与姿态，使汉口成为一座可感、可见、可记的市井之城。

节庆灾异的交织

城市有它热闹的一面，也有它难以抹去的创痛。在叶调元的诗里，节庆与灾异并存，他用简洁而有力的语言，把汉口民众中的欢笑与苦难，一笔一笔记录下来。

除夕，一年最深的夜晚，只愿梦里得财得运。诗中写道：“除夕酣眠味更醇，莫怪



《汉口竹枝词》

俗人呼‘挖窖’。”梦是一种寓意、一种希望、更是一种无声的祈祷。

端午，是汉口最为热闹的节日之一。从艾草插门、箬粽飘香，到龙舟竞渡、标船募资，诗人描写了整个端午的节奏与仪式。

“艾糕箬粽庆端阳，鳝血倾街秽莫当。”卖鳝的、煮粽的、扎包巾的孩童、奔走的马夫，这些场景不再是古意盎然的节令图，而是带着鲜明城市气味。“龙船经费有标船，半臂包巾五色鲜”。在这里，龙舟不只是竞技，也是一场商家广告宣传、各帮角力的重要日子。

到了七月的中元，街头灯火连绵，纸钱漫天飞舞，城中的节奏转为低回。“中元包袱万家同”，汉口人以纸包袱为阴间亡魂送食，没有早晚课诵，却有满城烧纸的烟雾与诚心。“瑜伽焰口放中元，尺五长幡大路边”，焰口法会从街边灯下展开，那一盏一盏灯火，是汉口人在都市边缘对死亡的安抚。

但节日过后，城市记忆中还有灾难的暗影。汉口靠水而兴，也因水而患。辛卯、戊申、己酉，这些年份成了民众生命中的断层。诗人记录：“岁当己酉水弥凶，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大水无情、揽舟难行，富人逃离、贫者丧命，社会的失衡在灾害中暴露无遗。

诗中还记载着“火灾庚午已无伦，乙巳年中又一巡”，塘角火灾烧得街道尽毁，万户哀鸣。“尸体半随流水半成烟”，连收尸都难，生者苟活于焦黑瓦砾间。叶调元不是用文人笔墨来叙灾，而是用直观的语言来书写城市的创伤。

这些诗句所承载的，不只是纪实，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节日不只是年岁轮回的标记，也让人记得曾经的欢聚与渴望；灾异则像城市上的疤痕，隐痛却清晰，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

汉口这座城市，在叶调元笔下，既有纸钱满街的烟火，也有水退后丈量观音阁水痕的忧心。在节与灾的交织中，我们才得以看见那个立体的汉口。

叶调元没有为我们画一张汉口地图，却给了我们一双看见城市的眼睛。街头、庙口、茶楼、码头，他写的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民众的生活痕迹。这些竹枝词，让我们今日所见的汉口，不止于“九省通衢”的繁华，而是一座真实有声、有泪、有体温的城市——活在人间，也活在诗里。

黄学文，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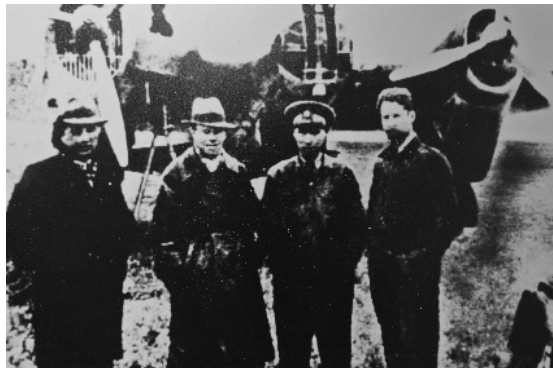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八）

◇ 刘宝森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武汉保卫战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向苏、美等国发出求援呼吁，苏联是唯一由政府出面作出响应的国家。1937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0月组成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至1938年2月，共援助作战飞机390架，其中战斗机230架、轰炸机160架，由阿沙诺夫率领来华参加空战，功勋卓著。

1938年1—2月，由31架轰炸机组成的波雷宁编队抵达武汉，由40架歼击机组成的扎哈罗夫编队抵达南昌。苏联机组人员都从阿拉木图起飞，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历经严酷的飞行考验，分赴南京、武汉和南昌。还有大批飞行员是从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抽调组成的，波雷宁编队就有150名飞行员来自那里，他们沿着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兰州飞抵汉口。这两条航线穿越荒漠、山地和杳无人烟的蒙古大草原，没有可接受C B型重型轰炸机的机场，各机场之间没



1938年，中苏飞行员在汉口机场合影



苏联轰炸机编队出动

有通讯联系，也没有气象资料。苏联飞行员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航线上飞行，运送人员和武器弹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他们都是优秀的飞行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从而出色完成任务。

南京沦陷后，中国抗战主战场转到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1938年2月中旬，一批苏联飞行员来到华中，武汉约有100架飞机，波雷宁的35架CB型轰炸机编队和伊万诺夫的60多架И-16型歼击机编队。

当月，波雷宁编队的9架飞机从武汉起飞，成功袭击日军杭州空军基地，炸毁30架日机，烧毁飞机库和军需品仓库；另一机群炸毁停靠在杭州车站的日军列车。苏联飞机无一损失，全部胜利返航。18日的武汉空战中，苏联志愿队共击落日机12架，但战斗机队大队长拉赫诺夫等献出生命。

台湾的台北松山机场集中有日军大量准备就地组装整机的飞机部件。2月23日苏联红军节这天，波雷宁指挥10架轰炸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采取节省燃料的5500米高度直线飞行。在飞机没有供氧设备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飞越海峡袭击松山机场。霎时间，数十架日机被炸得七零八落，十几座油库和机库

陷入一片火海，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转眼灰飞烟灭。

苏联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在没有歼击机掩护下高空飞行，在完全不熟悉的地域实施远程突袭，却能准确捕获目标完成作战任务，这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是奇迹。

4月29日，是苏联志愿队保卫大武汉的著名空战。这一天，日军出动几个轰炸机编队，在歼击机掩护下来袭。雷恰高夫、雷托夫、伊万诺夫、布拉格维申斯基、扎哈罗夫等苏联指挥员根据情报，预先拟定反击计划，将总共100余架И-15、И-16歼击机秘密集中在汉口地区，每一个飞行员都确定好自己的作战位置、起飞时间和飞行高度，作出强力打击和负责掩护的分工。

这次空战，日本出动歼击机和轰炸机共61架，中苏飞行员60余人起飞迎敌。上午10时，敌机进入武汉空域。中苏飞行员在不同高度与敌机格斗，形成垂直交叉作战的激烈场面。苏联飞行员金加耶夫首先击落两架轰炸机，其中一架是日军大佐驾驶的编队主机，其余飞机掉头逃命。随后赶到的两个日机编队，见势不妙也掉头回逃。布拉格维申斯基指挥歼击机编队尾随追击，以最高速度追击200余公里，击落几架敌机，其中克拉夫琴科一人就击落两架。这次空战敌机损失21架，中国只损失2架。

5月31日，日军出动18架轰炸机、36架歼击机再次袭击武汉，但命运与上次一样悲惨，14架被击落。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其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8月12日空战中，由尼古拉因科指挥的40架歼击机迎战敌机120架，以付出5架的损失击落敌机16架，成为这次空战的胜利者。

克拉夫琴科8次打下6架敌机，曾两次



苏联纪念邮票上的苏联英雄克拉夫琴科

被击落而跳伞逃生，后获得苏联英雄最高荣誉称号。另一位飞行员阿·伊·普希金未满23岁刚结婚，主动报名来到汉口，参加第一次空战后就获得一枚奖章，与战友成功击沉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后回国参加卫国战争，也获得苏联英雄荣誉。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期间，苏联志愿队进行最激烈和时间最长的空战，对抗日本空军，轰炸日军舰队，承担超常的作战负荷。每个歼击机飞行员在5—6个月期间，飞行150—250个作战小时，而每个轰炸机组要完成15—20个作战目标。他们常常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机作战，许多苏联飞行员献出宝贵生命。

位于汉口解放公园内苍松翠柏之间，高耸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纪念碑碑文中写道：“一九三八年，当中国人民正遭到日本法西斯疯狂侵略的时候，苏联人民无私地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了中国，援助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烈士们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溶结在一起了。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里。”

航空事务顾问陈纳德在武汉参谋空战

1935年5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实施改组，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宋美龄出任秘书长。1937年初，宋美龄通过霍尔布鲁克，向退役美国空军教官克莱尔·陈纳德发出工作邀请。陈纳德接受邀请来到中国，直至1942年回到美国军队前，其官方身份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航空事务顾问。

陈纳德原定赴华3个月担任临时性顾问，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正在洛阳航校考察的他立即给蒋介石发电报：愿意以任何形式、任何身份为中国服务。甚至在美国政府答应日本要求，决定撤离在华美国飞行员，上海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暗示他若不听命回国“面临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失去美国公民资格”时，陈纳德仍坚持留在中国。他的想法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袒露无遗：“中国一直把美利坚合众国及美国公民视为伟大的国家和人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友谊和同情是毫无私心的……中国现在是在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而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和杀气腾腾地



航空事务顾问陈纳德



蒋介石、宋美龄与陈纳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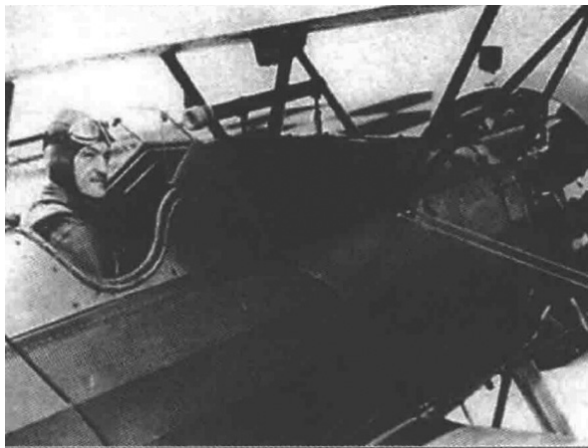
去进攻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度，凭着良心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反抗的义务来”。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陈纳德随着航空委员会撤到汉口。其任务主要是给中国飞行员讲授飞行技术，教他们如何驾驶战斗机去攻击日军的轰炸机，如何避开敌人的高射炮去袭击敌人。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过他所教授的技术：“我教给战斗队联队一种夜间俯冲轰炸的技术，这就是将一艘日本驱逐舰的轮廓在机场用许多煤油灯照射下勾画出来，作为假想目标，然后飞机在射击死区——3500英尺的高度飞入。这样的高度对轻型高射炮来说太高，而重型高射炮轰击又显得太低。我告诉他们要学会等待，直到目标出现在他们飞机机翼的后缘时，便关闭油门，作一个快速的横翻，垂直俯冲。这时心里开始计数，当数到15时，转为水平飞行投放炸弹。完成任务后，飞机立即开足

马力，尽可能贴近地面撤去。大约做过3次演习之后，这些飞行员相信，他们已掌握这种方法，然后他们便用这种战术去攻击在长江上航行的日本战舰。”

在武汉，陈纳德仔细观察日军飞机编队飞行的阵势，观察日本空军与中、苏空军的作战过程后，对日本空军的空中战略战术与技术等诸方面问题作详细记载与研究，为其后与日本空军的对抗积累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作为一名对轰炸机与战斗机颇有研究的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仔细研究日式飞机与美式飞机的特点，“日本人拥有超轻型单翼战斗机和双浮艇海上战斗机，日本人不惜一切地进行改造，使战斗机获得难以置信的灵敏性，这样，当两机尾追混战时，他们便可灵活地掉头、回旋”，美式鹰特飞机“造得十分粗壮，用牺牲灵活性来换取强大的火力，良好的生存能力与快而稳的俯冲速度”。日本飞机的轻型结构固然有助于它的灵敏性，但不堪碰撞，陈纳德在航空队服役时曾做过一种试验，“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可以撞掉对手的机翼或机尾”，同理，他在给中国飞行员讲课时建议，一旦处于困难的境地，可用自己的机翼死死勾住日机的机翼，



陈纳德在飞机机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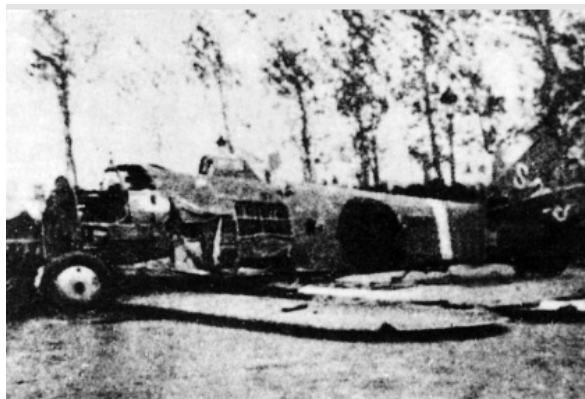
开足马力撕下日机的翅膀，坚固的美式飞机则能保持无损。这种战术在战斗中初见成效。有几名中国飞行员以自己飞机轻微的损失，连根拔掉日本战斗机的机翼。

在武汉，陈纳德发现苏联飞行员对冲撞技术很感兴趣，“特别是因为他们的飞机上那种粗短的机枪，使飞机必须在距敌机 50 英尺以内才能开火击中目标，而使用冲撞术则显得更方便”。之后，苏式飞机随着机件更新改良冲撞战术，用钢制“螺旋桨去咬掉敌机的尾翼”，在对德战争中，就成功地运用过这种战术。

陈纳德根据蒋介石的要求，组建一支外国雇佣军——国际志愿中队。1938 年 1 月，国际志愿中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 14 队，开始驻汉口，后调往孝感。

1938 年 4 月 29 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陈纳德与中、苏空军指挥官断定这一天日机不会空袭，决定惩罚日本侵略者。为引诱日机来犯，陈纳德建议中苏飞机佯装撤离汉口飞往南昌，夜里再溜回汉口。飞机起飞后，在武汉上空盘旋，让地面都能看见，以此蒙蔽日本间谍。日军获知间谍情报，认定武汉无空战力量，让日机多装弹少装油，仅带一个往返航程的汽油。29 日清晨，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自芜湖机场飞临武汉上空。

陈纳德事先侦得日机只有从芜湖至汉口一个来回的汽油量，派出 20 架战斗机在城南拖住日军战斗机，使他们消耗大量汽油。而城内则由 40 架苏军飞机埋伏在高空，等日机返回芜湖时把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开，使其战斗机因缺油不敢去保护轰炸机。中苏飞机一队攻击轰炸机，一队攻击战斗机，将其 39 架击落 36 架，只有 3 架落荒而逃。在这次空战，中苏飞机各损失 9 架。中国飞行



日机残骸在武汉中山公园展览

员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 5 架敌机围攻，飞机油箱着火。他本可跳伞求生，却勇敢地用本机撞击敌机，与“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经过武汉空战，中国空军因战斗伤亡减员，但因空战胜利显示出威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1938 年 6 月 1 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给敌机以重大的打击》短评称：“现在应用一切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献机抗战的运动，号召优秀青年到空军中去，充实空军力量，以回答暴敌狂炸，给打击者以致命的打击！”

1938 年夏，陈纳德奉宋美龄之命离开武汉，到昆明航校用美国模式锤炼一支中国新空军。

主要参考文献：

- [1] 雪融开、阎晶：《苏联与中国抗日战争史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2] 杨菁：《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我在汉正街长大（一）

◇ 李胜洪

汉正街是一条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街道，因汉水码头的兴起而繁荣。1945年，我出生在沿河大道303号以竹篙为营生的家中。我家房屋很大，三进两个天井，大门紧邻河边，后来为修防水墙和沿河马路，前后退拆三次。因此，我虽出生在河边，但成长在安定巷。

安定巷紧靠杨家河，也是有点来历的。清雍正年间，为分段管理十多里长的汉正街，设置了两个巡检司衙门，一个是礼智巡检司，衙门驻扎在万寿巷；一个是仁义巡检司，衙门就驻扎在安定巷。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汉正街从硃口到武胜路一带，就是我青少年时期行走的江湖。

走在汉正街，我们习惯称硃口方向为“高头”，称集家嘴方向为“底下”。总的来说，“底下”比“高头”繁华热闹，一方面大码头多集中在那里，一方面靠近旧租界华洋贸易繁荣。尽管如此，汉正街“高头”一带更具烟火气，老汉口原汁原味的风貌，犹如一幅汉版“清明上河图”。

如今我已是八旬老人，穿过时光的隧道，1960年代前后的汉正街风情，徐徐浮现在脑海。

从清泉池澡堂到老同兴酱园

从硃口到武胜路，汉正街店铺林立，虽没有谦祥益、汪玉霞、苏恒泰那一类老字号大铺子，但也有一些老字号小店可圈可点。他们共同营造了老汉正街的繁华，镌刻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现在想忘都忘不了。

清泉池澡堂，是我小时候随着父亲经常光顾的地方。武汉冬天寒冷，居家没有洗澡条件，一般都会选择去澡堂，尤其是春节前，洗个澡，干干净净好过年。那时汉口的澡堂也很多，但能上档次的只有几家，如民族路的华清池，清芬路的德华池和硃口路的清泉池。毫无疑问，清泉池是设备最好、服务最全的一家。据说清泉池始建于民国初年，曾经楼上是茶社，楼下是澡堂，沦陷时期茶社关闭后专营澡堂，夏天澡堂歇业就兼营旅

社，可以这样说，清泉池是汉正街“高头”的一张名片。

我们多在晚上去洗澡，大门口白底红字的招牌灯伸出门楣特别醒目，里面十分亮堂。水磨石的地面，嵌彩色瓷片的墙壁，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绕过售票的柜台，几步下坡就进到右边宽大的更衣室，两边靠墙有30多张单人床，中间烧有两个煤炉，白铁皮的管道向上曲尺形通往窗外，暖融融的空气里弥漫着澡堂特有的味道。据说还有单间小房，那是贵宾室，收费肯定贵多了，只听说，没见过。床上有大浴巾和毛巾，墙壁上贴有提醒顾客小心财物的标贴。衣服脱了后，跑堂的把脱下来的大衣、外套用木杈子送上高高的挂钩上。

洗澡“三部曲”，先到水温较高的池子把身上的油泥泡软搓掉，然后到清水池中清洗，最后到淋浴间冲干净。那时我贪玩，好奇心比洗澡更胜，何况身上没有那么多油疙瘩可搓，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早早到床上躺下。老爸喝点茶，我就看看修脚和推拿的师傅“表演”，无比轻松惬意。穿衣后，在出门的过道上搓搓脸，适应一下外面的寒冷天气，一身轻松地尾随父亲的背影，走在夜静人稀的回家路上。

靠近兴隆巷，是孙福康和孙寿康药房，门面宽敞亮堂，中西药兼营，和“底下”的万鹤龄药房齐名，1956年公私合营时，与万鹤龄、同丰泰、久康等几家药店一起组建为硚口区药材公司。万鹤龄几家药店一直保留存在，而孙福康和孙寿康两家原址撤销，搬到硚口路成了硚口药材公司的中心药店。到改革开放，私企药店如雨后春笋，早已消失了的孙寿康招牌，又被私营药店套用了。至于这个老板和当年的孙寿康有没有渊源，那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前三镇有个民谣“喝好酒，到硚口”，硚口是槽坊比较集中的地方，汉正街就有好几家。在中山巷下首，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槽坊，老板叫杨敬洲，武昌豹子澗的人，和我姨叔父是同乡，因这个关系，我去过两次挑头子酒。槽坊门店不大，但里面别有洞天，蒸酒、出糟热气腾腾，排列着几十口大酒缸，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当时主要酿造的是汾酒，“汉汾”清澈透明，味醇爽口，是老武汉人的首选。这些大小槽坊，就是武汉黄鹤楼酒厂的前身。

老同兴酱园在天宝北巷下首，这是我初中老师代泽安家的产业，主要酿制酱油和制作酱菜，批零兼营，尤其是酱油质量很好，在汉口占有一席之地。代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时，我去过他家多次，宽敞的大院子安放有几十口大酱缸。和槽坊不同，酱缸都是露天搁置晒酱发酵，如遇雨天就用大斗笠加盖。斗笠竹篾编制，天晴揭开叠加存放。后来，这些酱园多合并搬到东西湖慈惠农场去了。

从三友玻璃到汉昌肥皂

解放初期，汉正街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织布厂，织布机从十几台到几十台以至上百台不等。公私合营后，合并成两家织布厂，一家是国光织布厂，另一家是硚口织布厂。

国光织布厂在汉正街天声巷口，前身是协昶和一元织布厂，1960年代生产的冲线呢是名牌产品。我的母亲是这个厂的老工人，见证了那个厂数十年的兴衰。

硚口织布厂在唐家巷通往长堤街的中间，规模比较大，前身是杨敬亭的织布厂。杨敬亭，武昌豹子澗人，是我母亲的堂姐夫，勤奋聪颖。他从学徒做起，扛过疋头走街串巷，几十年打拼事业有成，开了三家织布



汉正街景象（网络图片）

厂，分别在汉中路、花园北巷和天宝北巷，并在广州设有销售门店。1956年公私合营，以他的厂为主，合并几个小厂成立硚口织布厂。后来，我的这位表姨父以资本家的身份从事验布工作，最后享高寿无疾终老。

天安味精厂在天宝北巷汉中路上，它是武汉味精厂的前身，生产的大桥牌味精是省优产品，畅销全国。这个厂最早由长堤街的几家面筋作坊组建而成。我的小学同学胡三堂家就是小面筋作坊，我在他家看过面筋的制作过程——先把面粉和好，在案板上反复揉搓，然后放在一个大的石臼里，人光着脚丫在里面踩踏，踩踏到一定程度面粉成筋后，拿出来用水冲洗，去除淀粉，剩下的就是面筋了。新鲜面筋再腌制加工，就成了味道特别鲜美的臭面筋了，是很多老汉口人桌上的下饭菜。后来天安味精厂搬到汉阳去了，改名武汉味精厂。

武汉猪鬃厂在汉正街248号，仙山巷的对面。猪鬃是猪背脊上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不仅刚韧富有弹性，吸附性能好，而且耐磨、耐高温、耐酸碱，是工业和军需的重要原料，历来是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由于收购上来的猪鬃颜色、质地参差，需要“摘毛”

处理，厂家就把猪鬃发放给附近居民摘，按斤付给费用。不过摘猪鬃不仅有股难闻的气味，而且很伤眼睛，但报酬相对糊火柴盒要高一些，操作也简单些。这项劳务，当年也是我家副业创收的项目之一。

武汉玻璃厂历史悠久，开汉口玻璃行业之先河，解放前叫三友玻璃厂，1964年改为现名。厂区很大，门面开在汉正街，厂房延伸到汉中路，主要生产玻璃仪器。我曾进去参观，看到工人用一根长铁吹棍吹

瓶子，从高温炉里取出红彤彤的球形玻璃熔液，不停上下摆动中同时对口猛吹，很快一个啤酒瓶就成型了。这是个辛苦活，又热又累。武玻在街对面建了一个灯光球场，晚上灯火通明，如有比赛更是热闹非凡，是汉正街的一个亮点。武玻后来搬迁到武昌张家湾，现名为武汉长利玻璃有限公司，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玻璃制造厂。

汉昌肥皂厂在汉正街武胜路口（当时的武圣庙），据说是爱国商人陈经畬为抵制洋货，筹集4万两白银于1915年建成，生产“七星”“蝴蝶”牌肥皂，是汉口较早的肥皂制造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武汉化工厂。1970年代初，与坐落在汉中路的扬子化工厂一起搬迁到葛店，组建成中南地区最大的化工企业葛店化工厂，汉正街的旧址成了它的办事处。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化工厂的厂长，恰好是我两个同学的父亲——扬子化工厂的厂长是曹道德同学的父亲，武汉化工厂的厂长是郭德斌同学的父亲，真是无独有偶。（待续）

李胜洪，退休前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印刷厂厂长